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

為緬懷澳門著名學者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澳門學者同盟於2025年6月28日在澳門舉辦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楊允中教授生前曾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學者同盟會長等職務，畢生奮鬥在“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第一線，成果豐厚。他的《“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我的“一國兩制”觀》、《“一國兩制”理論縱橫》、《“一國兩制”實踐論》等著作，都是“一國兩制”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是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人士應備的重要讀本和參考資料。同時，楊允中教授熱心投入社會服務，參與發起創建多個澳門學術團體，推動本地學者投身澳門學術研究，為澳門本地學術團體的成長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座談會上，與會者回顧了楊允中教授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基本法理論和微型經濟體等方面的學術思想和觀點。韓大元教授、鄒平學教授及冷鐵勛教授還專門提交了文稿。現將相關文稿以及各與會者發言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Leong Wan Chong's Passing and His Academic Thoughts

To commemorate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passing of renowned Macao scholar Professor Leong Wan Chong, the Union of Macao Scholars held a memorial symposium on June 28, 2025 in Macao. During his lifetime, Professor Leong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Macao SAR, a deputy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member of the Macao SAR Basic Law Committee under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of Union of Macao Scholars.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pioneering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th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s. His works, includ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Modern Constitutional Science*, *On the Macao Implementation Patter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y Outlook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Theor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On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re all seminal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tudy. They serve as essential reading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scholars engaged in this area. Professor Leong enthusiastically engaged in social service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nding of multiple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Macao. He encouraged local scholars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Macao academic research,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academic community.

During the symposium, participants reviewed Professor Leong's academic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theory of the Basic Law, and micro-economies. Professor Han Dayuan, Professor Zou Pingxue, and Professor Leng Tiexun also submitted special manuscripts. The relevant manuscripts and the speeches delivered by all participants have been compiled and published here for our readers.

主辦：澳門學者同盟

時間：2025年6月28日（星期六）早上9時半至12時半

地點：澳門皇都酒店2樓維凱廳

主持人：駱偉建（澳門學者同盟會員大會主席）

與會者：陳海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局長）

許麗婷（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研究室處長）

韓大元（中國人民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所所長）

胡錦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鄒平學（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

吳志良（澳門學者同盟會員大會創會主席、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趙國強（澳門大學法學院客席教授）

劉本立（澳門經濟學會會長）

冷鐵勛（澳門學者同盟常務副會長、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

麥瑞權（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家國情懷歷史學會會長）

蔣朝陽（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禹（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林玉鳳（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

陳志峰（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高展鴻（原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李燕萍（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梁淑雯（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庄真真（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何曼盈（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陳慧丹（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會議紀錄：澳門學者同盟秘書處

發言紀要

駱偉建：紀念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暨思想學術座談會現在正式開始，在開始之前我想跟在座的各位介紹幾位參加今天座談會的重要嘉賓。首先是我們學者同盟創會會長吳志良博士，還有澳門中聯辦研究室的許麗婷處長。然後給大家介紹遠道而來的內地三位頂尖學者，他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韓大元教授和胡錦光教授，以及深圳大學的鄒平學教授。再有，楊允中教授的親屬，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陳海帆局長也來到了會場。其他我就不一一介紹了，大多都是長期跟楊允中博士共事，有很多交往的朋友。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座談會上，能夠從各自的角度追溯並談談楊允中博士的一些學術思想。

首先請學者同盟副會長梁淑雯播放一個關於楊允中教授生平介紹的短片。之後先有請吳志良主席發言。

吳志良：今天學者同盟舉辦紀念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座談會，非常有意義。我自己寫了一篇文章來紀念楊允中教授，準備在《澳門日報》明天刊出。在此，我有幾句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楊允中博士在澳門不僅僅是一個學者，已經是個坐標，是濠江學府天空中最亮的星宿之一，這是大家對他的評價。因為我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與澳門社科理論界一起成長，楊允中博士是澳門學者同盟最早的創立倡導者。楊允中博士的一生是跟澳門這個城市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老舉這個例子，澳門當年的博彩業開放，楊允中博士和黃漢強等幾個人真是冒着風險向國家提建議。在那個年代這份勇氣不是一般人有的，他們也是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們沒有畏懼，這種無畏精神一定要傳承下去。澳門回歸前楊允中博士和我以及其他研究澳門歷史的人，牢牢掌握了澳門歷史的話語權，沒有一點擔當的精神是很難開展相關研究的，這種學術上的擔當和勇氣，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的。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楊允中博士在理論研究方面有獨特貢獻和成就。第一個重要成就是他提出過澳門屬於微型經濟的理論，這奠定了澳門經濟學研究的基础，只是後來沒有太多人去把它深化，對此一定要充分肯定。對於澳門經濟，早年的時候黃漢強等做了一些資料的收集和研究，真正形成理論化、規範化成果就是楊允中博士提出的微型經濟理論。理論研究方面的第二個重要成就是創辦“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是澳門特區歷史上唯一的一個行政長官批示成立的學術機構。當然，包括學者同盟也是他有份創立的。楊允中博士早期的時候，在澳門基金會有一個學術顧問的職位，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編輯出版《澳門大百科全書》等。第三個方面的重要成就是加強學術平台建設，創辦了《澳門研究》、《“一國兩制”研究》學術期刊。《澳門研究》一直沒有成為內地C刊，原因之一就是楊允中博士和我都認為應該給年輕學者提供發表文章的機會。內地C刊的編輯在採納論文時往往注重作者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力，這對剛出道的年輕學者是十分不利的。澳門當時鼓勵年輕人去讀碩士博士，但他們第一次發表文章的水平客觀上不是很理想，楊博士和我都希望有個平台供他們發表作品，所以我們當時對論文要求沒那麼規範，沒那麼嚴格，後來才要求慢慢提高，而且總要留1/4的篇幅給青年人。楊博士後來創辦的《“一國兩制”研究》也延續了這種傳統，這也是非常難得的。正

是重視了學術平台的建設，為年輕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園地，推動了澳門社會科學學術的發展。這個園地我們用文學的語言來講，就是百花园，希望大家在那裏能夠成長。

去年《澳門理工學報》讓我寫篇文章，在文章中我回顧了澳門回歸前後25年有關澳門學的學術發展史，當中有兩點作了特別強調。第一，澳門學術發展史的道路，從奠基到通車，每一公里每一米每一厘米都有楊博士的汗水，這點我們一定要記住，我們一定要告訴後人。第二，楊博士的學術，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且都力求付諸實踐。在澳門這個很小的社會，學界的很多想法，很容易得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認可與接納，其中就與楊博士的呼籲和推動密切相關。在這方面，澳門的學術貢獻跟其他城市還真不完全一樣，澳門的學術所起的作用遠遠就比其他城市要大，因為它是個微型社會，它是個人際關係非常密切的社會。在澳門學術界，我們要向楊允中博士學習，樹立我們獨立思考的這種精神，而且要有一種勇氣，無論是談問題還是肯定成績，特區發展中存在的不足方面，我們也要直接提出來，並去推動改善，這樣學術就能發揮促進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

韓大元：楊允中先生是澳門學術界的一面旗帜，也是“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在澳門的奠基者。但對我和錦光教授來說，他是我們人大法學院的傑出校友。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緬懷以學術為生命，為“一國兩制”理論研究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著名學者楊允中先生，同時也代表了來自母校的師生們對楊允中先生的思念。楊允中先生的學術貢獻，剛才吳志良主席已經講了，“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冷鐵勛主任還有一個詳細的學術梳理稿，對此我不再做說明，我想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楊先生在人民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一些情景。我來澳門參加這次活動之前，讓學生到人民大學檔案館查了一下楊允中先生的學籍檔案材料，我也是第一次完整的看到這個檔案材料。

檔案中有楊允中先生1993年申請學位的時候錄取的文件，特別是楊允中先生制訂的三年詳細培養計劃，包括研究計劃，閱讀書目等。楊允中先生答辯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全部人員都給了高度的評價。1993年時，楊先生已經是60歲高齡，在已經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後，還要讀法學博士。之所以如此，楊允中先生認為香港、澳門即將回歸祖國，我們需要培养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針對1997年到1999年，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急需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的客觀需要，楊允中先生希望通過3年的憲法學專業學習，以充實自己的綜合科研能力，為澳門的法制建設貢獻才智，為澳門的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用。這些設想都詳細記載在他的培養計劃中。所以，如果沒有對“一國兩制”事業的這種熱愛和追求，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何況楊允中先生當時屬於高齡，在澳門和內地已經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且已經有個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如果没有致力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這樣的一種學術使命，是很難做到這樣的。我專門重新讀了楊允中先生的一些論文和著作，覺得楊先生對“一國兩制”的研究，是對整個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研究，因此，我準備了一個書面發言材料，題目就叫《“一國兩制”理論的探索者——楊允中》。下面，我給大家介紹這篇發言稿的內容。（具體內容略，詳見本欄目專稿）

胡錦光：我認識楊老比較晚，楊老到人大念博士的時候才認識。楊老是1993年到1996年在人大讀博士。這樣算起來的話，楊老還是我博士的師兄，我是1995-1998年的博士。楊老讀博士期間經常去找許崇德老師，在許老師家裏面見過多次。後來我到澳門開會，包括到理工開會，還有到澳大開會，在會上都能見到楊老的身影。剛才韓大元教授概括了兩個數據，讓我們很敬佩，一個60歲高齡的人還要求讀博士學位，非常難能可貴。第二個數據，剛才講他寫的論文將近500篇，還有很多著

作。我覺得楊老一個是年齡高齡，第二個事務非常多，還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在這麼繁忙的情況下能寫出近500篇論文，很不簡單。楊老給我的印象，就是精力非常充沛。無論是組織一些學術活動，還是參加學術活動發言來闡述自己學術觀點，都非常積極，似乎不知疲倦，展現了驚人的活力。

對楊老的學術貢獻，我選摘楊老接受採訪時的一些觀點來談談。第一點，楊老說澳門寬鬆的社會環境主要得益於“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澳門堪稱“一國兩制”的大型陳列館。澳門所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跨越式發展是驗證“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最有說服力的典例。楊老曾講，有人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核心是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這個說法是不妥當的。香港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中的一部分，這一點必須清楚。那麼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等於納入資本主義。楊老在一次接受採訪又講了，說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絕不意味着香港社會從回歸到現在，每個領域都是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如果認為香港現在還是100%的資本主義，這是莫大的荒謬。

第二點，對於特別行政區制度，楊老認為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經濟是“一國兩制”的經濟，政治是“一國兩制”的政治，文化是“一國兩制”的文化，這個定位至少在理論界已經非常明確清晰，把“一國兩制”作為正面的理念、成功的發展模式來理解，不僅與兩個特區的繁榮穩定息息相關，與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均息息相關，因此需要建立全民的“一國兩制”信念。居民要加強國家認同和國家意識，全國人民要共同把“一國兩制”事業做好。當然，從微觀上說，特區也不能躺在國家的政策上。

第三點，對於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楊老態度明確，立場鮮明，認為這是中央事權，特別行政區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後，楊老接受採訪的時候，講到按照《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該自行立法，但20多年來那麼明顯的缺口沒有及時補上，不客氣的說不是簡單的立法拖延問題，是香港某些人在搗亂，故意設置障礙，使得一個正常立法程序受到干擾，一再拖延。

剛才吳志良主席和韓大元教授也都回顧了楊老的一些基本的學術觀點，並進行了歸納。我覺得楊老的一些基本觀點在今天依然是適用的，在今天看來，我覺得仍然是很新穎的。從這些觀點來看，楊老的視野非常寬廣，他除了是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之外，楊老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的領域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且楊老的思想非常有深度。當然，我覺得更展現了楊老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熱愛澳門的這樣一種情懷，特別是他堅決擁護“一國兩制”，宣傳和闡釋“一國兩制”，積極踐行“一國兩制”的這種國家情懷。楊老這麼活躍，這麼積極思考問題，而且能够保持一種前沿的那種水平，都非常值得敬佩，我們應該向楊老學習，向楊老致敬。

鄒平學：剛才聽了吳志良主席、韓大元教授、胡錦光教授的發言，以及對楊老一生的簡單回顧短片，感觸良多。我來參加今天的活動之前，準備了一個書面發言稿，下面，我簡單介紹發言稿的內容。（具體內容略，詳見本欄目專稿）

高展鴻：我有幸跟楊博士一起工作過。今天在坐的人員中，我與楊博士一起工作的時間應該是最長的。我跟楊博士是相識於1988年10月，然後整個澳門基本法的起草諮詢過程，整個澳門後過渡期，我們都是緊密地一起在工作。回歸以後，他既然是我的老師，在工作方面給我好多指導，同時我跟他共同參與了他參選全國人大代表的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歷歷在目。我想講的是，楊博士的工作態度。楊博士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大家都知道楊允中有兩個博士學位，第一個博士學位是經濟學，他原來是念俄語的，澳門基本法起草時，1988年我倆是最早參與基本法諮詢的籌組工作。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是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要求組織來成立的，工作任務相當繁重。當時我們在招聘人員時，第一次向全澳門公開招聘。秘書處工作是由我們開始做，經考試招了一大批年輕人，很多都是剛剛大學畢業。這些人對“一國兩制”也不是很了解，抱着打工的心態來工作。楊博士在他主持秘書處工作過程中，悉心培养年輕人，並放手讓年輕人工作。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工作中，當時澳門經濟要面對一個配額的狀況，將來配額取消的話怎麼辦？楊博士認為要研究這個問題，他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基礎理論不強，所以他要學一個從來沒研究的課題領域即經濟學。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求學經世致用。後來他有系統地學習法律，也是為了更好研究澳門特區的法制建設工作，因為澳門回歸後，要實行澳門基本法，沒有紮實的法學基本功底，很難正確理解和貫徹好澳門基本法。

我當時在楊博士的推動下，也到暨南大學讀經濟學。楊博士不僅在理論研究上注意本地化，在平時生活上也很注意本地化。楊博士的廣東話，有些內容聽不懂，但他堅持學習廣東話、講廣東話。他說澳門居民大多講廣東話，為了便於溝通，一定要學習廣東話。另外，在推廣澳門基本法時，楊博士要求我們用澳門居民聽得懂的語言來講，他也是這樣來要求自己的，對此我深有感觸。

習近平主席在2024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成立25周年時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要推進“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並闡述了“一國兩制”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護。這些講話是以前沒有的。對此，特區政府以至全社會都要認真學習領會，並貫徹到“一國兩制”實踐中。我們緬懷楊博士，就是要學習他心繫祖國、心繫澳門的胸懷，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斷開創澳門發展新局面。

麥瑞權：我與楊允中教授的交往，是從楊教授帶領學者同盟的人員去台灣地區交流開始的。回澳後，我實際上很多事情都向他討教，聯繫便多了起來。我覺得他是一個用行動來實踐“一國兩制”的學者，他也是我人生的導師。

從台灣地區交流學習回來後，楊教授經常鼓勵我怎麼做好一個澳門人，從澳門人的視角去實踐“一國兩制”。2009年我參選立法會選舉時，他陪我一起報名，還站在我後面。當時他的身份地位很高，是全國人大代表。有他支持我報名參選，報紙都登出來了。有人問我與楊教授是甚麼關係？他為何要幫你參選站台。當時我也没跟其他人說甚麼，其實我今天才說出來，他不單是在理論研究工作中“愛國愛澳”，而且在行動上也是“愛國愛澳”。後來，楊教授帶領澳門學者同盟人員到武漢交流訪問時，又鼓勵我報讀華中科技大學的博士學位。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報讀了華中科技大學相關博士學位，後來論文寫作中又得到了楊教授的鼓勵和指導，順利完成了學業，取得了博士學位。

我在《澳門日報》發表文章，也得到了楊教授的幫助。有一篇文章是關於澳門人眼中的中國共產黨的內容。雖然我之前也用澳門視角去思考、解釋共產黨所做的一些幫助澳門發展的事情，但要開始寫的時候，還是有些顧慮。得知這個情況後，楊教授鼓勵我大膽寫。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時候，澳門居民很多人去觀看展覽。如果澳門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卻不了解共產黨為保持澳門的穩定發展所開展的相關工作，這是有點遺憾。有些澳門年輕人以為他們有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因為澳葡政府發展博彩業所致。其實，澳門回歸後之所以有博彩業的發展，關鍵還是中國共產黨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方針，就不會有澳門的繁榮穩定，更不用說博彩業的發展了。“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之所以能得到正確實施，離不開理論界對“一國兩制”的研究和宣傳推廣，這其中就有楊教授的貢獻在內。

後來我在十幾場講座中以“澳門人的眼中的中國共產黨”為題進行宣講，不僅在澳門的中學、社團、大學我有講，而且在內地的大學我也講，廣受歡迎。這就說明楊教授很有眼光，這實際上澳門人用行動來表達感恩國家的支持。今後我會按楊教授的指引，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用行動來表達我們對中央政府的感謝感恩。

陳志峰：我今天是代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來發言，談談楊教授跟發策中心的一些交往歷程。2018年發策中心做過一次口述歷史，叫“共建共享，發展同行”。當時候我們排序的話，楊教授是第二位，作為發策中心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見證者。然後，在這本書當中，我想說一下當時候楊教授不是單單對發策中心，而是對整個澳門的理論學術界來發表意見。

第一，他提出了“三高兩強兩深度調整”。甚麼是“三高”？一是指高發展指標，二是高綜合競爭力，三是高社會發展成果。“兩強”，是指強政府和強社會。“兩深度調整”，即產業結構深度調整和社會結構深度調整。雖然“三高兩強兩深度調整”的觀點是在2018年提出的，但是我覺得今天還是很有參考價值，這是我當時候參與口述歷史工作一個很深的感覺。

另外，楊教授在口述歷史的時候也講過，發策中心成立的時候，他有份參與。所以，為甚麼我說楊教授對發策中心、對澳門學術界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他也提出，澳門回歸後，發策中心和經濟學會兩個社團的合作，後來就出版了一本題為“澳門未來20年的遠景目標與發展”的研究報告。這份研究報告是中英雙語的，寫於澳門回歸後不久，現在再看報告內容，好像穿越回去，重新再寫一遍似的。它對於整個澳門，特別是回歸後前20年整個發展的一個軌跡，基本可以說是完全一語中的，這對我來說震撼太大。楊教授他們預計澳門回歸之後的未來20年的發展，從20年之後再驗證，就發現他為甚麼那麼厲害，真的是非常精準地把這20年的社會發展藍圖勾勒出來，除了他的預判能力外，政府也充分採納了這批對澳門非常有心的學者，其中包括劉本立先生等等的學界意見。從整個澳門的學術理論界來講，包括我們學者同盟在內，肯定幫助也很大，而對於整個澳門社會發展，以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幫助都是非常大的。

劉本立：剛才在座諸位都講得非常好，深受教育。我與楊老交往超過40年了，真的很佩服楊老，工作態度非常認真、嚴謹。澳門回歸之前，我都和他一塊做研究，也參與過澳門一些重要學術團體的創建工作，包括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學者同盟、經濟學會。在創辦發策中心時，他也是

為了填補澳門在社會科學研究這方面的不足，多發揮一些作用。楊老找我一起參與創建澳門學者同盟，初心是甚麼？他的初心就是為了把澳門的專家學者凝聚起來，有一個很好的平台聯合起來。大家剛才講了很多都是關於他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我在這裏補充一下，在經濟範疇方面，他最早就研究澳門經濟的轉型、產業結構的轉型，而且在澳門來說是最早提出微型經濟體的理論。他認為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後來，經濟學會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有些文稿送給他審查，我覺得他每一頁都很仔細做修改補充。由此可見，他治學的態度很認真。他常說我們做研究一定要認真，包括一些格式問題，有些表述得不好的問題，他都指出來。

我們這幾年一直在做的澳門經濟指標體系，也得到了楊老的幫助。我們應該學習楊允中先生的治學精神，在學術研究這方面一定要傳承又要創新。

還有我補充一下，就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籌建的過程中，楊老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是法律小組和經濟小組兩個小組的成員。我覺得在籌委會裏面，他所提出的建議也是很多的，他當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每一年人大開會，他提出的議案都事關澳門的經濟社會建設。楊老的一生，真的是無負於“一國兩制”，無負於澳門，無負於祖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王禹：我原來是在澳門科技大學工作，後來到楊允中老師創辦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工作。首先，我認為楊老師的學術特點有三個：其一，他是跨學科的，因為他自己擁有法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其二，他是關注現實的問題，每天早上他很早就過來看報紙，對“一國兩制”動態追蹤，有學術敏感性；其三，他對學術充滿熱情，只要提議去做研究，他馬上就支持。

其次，剛才大家談到楊老師提出微型經濟理論的問題，我想補充一下。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有關與珠海的高欄港合作的文章，他的思想很超前。

第三，楊老師的《“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是他在博士論文基礎出版的書，除了是比較經典的著作之外，還有一本書很好，書名是《澳門基本法釋要》，在普及基本法當中也發揮很大作用，現在推廣協會還把它派發給學員。

第四，韓大元教授提出楊老師對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進行了的論證，這個我知道，因為當時是喬曉陽主任想論證特別行政區制度能否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為此還在上海與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法學研究所聯合開會。另外，《澳門基本法》第2條與《香港基本法》第2條是不一樣的，《澳門基本法》第2條多了7個字，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第2條是關於全國人大授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規定，《澳門基本法》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7個字，楊老師說這個是他本人提出來的，後來被採納了，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他去年離世後，我也寫了“真學者擔當，重家國情懷”的挽聯，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真正是具有這個家國情懷的。

趙國強：我覺得楊允中教授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一個地方就是執着。執着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工作的執着，二是對學術研究的執着。我與楊允中教授的認識應該是1991年我來澳門開始起草基本法的時候。駱偉建教授那時是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工作，我也參與秘書處工作。每次開會都要去，所以與楊允中教授接觸比較多。我發現楊允中教授對這工作非常認真執着。他有時候與高展鴻先生兩個人為了一個問題，爭的面紅耳赤。後來他到了澳門大學，工作一樣執着。再後來到

澳門理工學院成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個在全國來講都是開先河的，沒有第二個像“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樣的公立學術單位。所以，中心人員一定要把工作辦好，朝規範化發展，這也是楊允中教授的一片心血。楊允中教授對澳門的“一國兩制”事業貢獻真的是勞苦功高。

他對學術執着，我可以這麼講，對於“一國兩制”理論體系，楊允中教授是一個開拓者、奠基者。當然，奠基、開拓還有我們其他的老一輩，如許崇德老師、蕭蔚雲老師，等等。對澳門來講，楊允中教授真的是一個奠基者開拓者。我們寫“一國兩制”理論文章，沒有超過楊允中教授的，他還出版了《“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沒有這種執着的精神是做不出來的。所以，我對楊允中教授工作上的執着和學術上的執着，印象非常深刻。正因為有這兩個執着，他才有資格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上，作為一個堅定的開拓者，是非常合適的。

趁今天這個機會，我給學者同盟提出建議。現在澳門學者同盟在澳門學術界的地位已經建立起來了，應該思考如何把理論界跟基層的一些社團結合起來，開辦培訓班，傳承“愛國愛澳”精神，在澳門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林玉鳳：我應該算認識楊允中教授比較早的一位。1992年我當時還是記者的時候，就要不要建港珠澳大橋的問題，採訪了黃漢強老師和楊允中教授。我現在供職的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其實當年也是楊允中教授說服大學的校長建立的，他在整個推動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在澳門過渡期以及澳門回歸後，楊允中教授對澳門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就我個人而言，我有很多個地方要感恩他。

第一，剛開始我當記者的時候去採訪他，中間很多趣事，我最早的時候，不知是我普通話不太好，還是他當時口音也比較重，我採訪他的時候聽半天沒聽明白，我就跟楊老師說，你跟我講普通話就可以了。然後他說他就在講普通話，我還以為他講廣東話，所以我用了比較長時間去適應他口音。我去澳門大學工作以後，楊教授真的非常願意提攜後輩，他辦的每一個活動都請我去發言，我作為年輕老師，曾說自己不懂就沒發聲，他鼓勵我，觀察到甚麼就可以講甚麼，他在背後做了很多推動和鼓勵，對我們後輩來說非常重要。

2017年我到澳門研究中心主持工作後，楊教授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就把過去幾年《澳門研究》有錯的文章全部給我列出來，然後他說這篇文章的觀點有甚麼問題等等，令我很感動。楊教授都80多歲了，他還一直在看《澳門研究》的文章。他鼓勵我要把《澳門研究》放大來辦，不要往小去辦，並說辦大會辦大活動就不要躲在一個角落裏面就做小事情。這是他的真心話，他是真心相信我們做好澳門的研究，把澳門的“一國兩制”研究好，把澳門經濟研究好。這對澳門學術界非常重要，對我們這些後輩很重要，因為他看到澳門的潛能，澳門可以發光發熱，可以真的唱大戲。

蔣朝陽：感謝有這個機會，我也談一談對楊老師的感恩。認識楊老師是2003年下半年，我當時到澳門科技大學工作，然後通過了蕭蔚雲老師認識楊老師。2004年3月，基本法推廣協會開研討會，我參加了會議，以後每年的研討會等場合都能見到楊老師，這樣一來與楊老師接觸自然就多了些。我自己回想一下。2004年第一次發表有關基本法的文章，就是楊老師當時在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時的事，他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後來楊老師在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工作，經常請我給公務員基本法高級研討班上課，聽過楊老師不少教誨。楊老師是我無比敬重的一個學術前

輩，我有幾點感想，給大家分享一下。一是他的學術格局寬廣，大家剛才都提到了他是一個雙料博士，從經濟學到法律，所以他研究“一國兩制”的視野很寬闊。二是他的學術成就輝煌，他發表了500多篇論文，還有多部專著，這值得我學習。三是他的學術風格相當紮實，他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尤其是基本法。四是他的學術品格胸懷。他不遺餘力地提攜後輩，尤其是年輕人，這一點我是深深感受到。五是他的學術人格高尚，他為人剛直，但是又很中庸，處理問題都很周全。

梁淑雯：各位同仁，今天我們以學術之名紀念澳門學術界一位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者、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創立者和首任主任楊允中教授。楊教授是遼寧鐵嶺人，生於1933年。那是一個烽火的年代，他也因此培养了強烈的愛國情操。上世紀內地改革開放不久，他來到了澳門，紮根40餘年，始終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發展緊密相连，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澳門回歸祖國以及回歸後的繁榮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楊老始終致力於對澳門“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從回歸之前基本法的起草、諮詢到回歸之後的推廣，他都一直深入其中，而且盡心盡力。他通過著書立說構建起澳門“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體系。他的多部著作把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升華成為國家治理的智慧。更值得我們肯定的是，楊老一己之力開拓了澳門“一國兩制”研究的學術平台，吸引了更多的人投身於這個領域中。他主持過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更是推動創立了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透過舉辦不同的學術會議、學術活動，促進澳門與海內外學者研究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同時，他主編過《澳門研究》，創辦《“一國兩制”研究》學術期刊，利用這些平台，讓更多的學者有機會參與到研究澳門、研究基本法，研究“一國兩制”的隊伍中來。除此之外，他也經常帶着不同的學者或者年輕一代，與海內外學者交流，並向外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

楊老對於澳門學術界是貢獻良多的。他在2006年與吳志良主席一起創立了澳門學者同盟。經過多年的發展，澳門學者同盟如今是澳門學術界的一個公共服務平台。此外，澳門有很多個重要的學術社團，比如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經濟學會等等，楊老都是積極的推動者和創立者。這些社團促進了澳門學術理論界的蓬勃發展，並培養出了一輩又一輩的澳門學者，透過這些平台思考澳門，研究澳門，發展澳門，也讓澳門的學術理論界一直薪火相傳。

楊老師一直教導我，“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靈魂。在與他共事的十幾年裏面，我在他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學問，我更加學到了作為一個澳門人，作為學術理論的工作者，應該有的一種擔當。我記得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他仍然是在勉勵我，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要繼續努力，要有所擔當。

李燕萍：楊老師對年輕人非常寬厚。從我們中心人員的學術背景可以看得出來，非常的多元化，也就是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識，有一種開放性的思想和基礎。

我在跟楊老師交往過程當中，有以下幾點體會：一是他非常重視整體化和系統化的研究。他的整個中心思想就是“一國兩制”、“愛國愛澳”，就是說既要愛國又要愛澳。我舉兩個例子，一個

是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建構，他認為需要對澳門比較零散的，或者是源自於葡國的法律進行歸納和整理，形成一個具有本土特點的系統化的東西。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又有非常強烈的國家意識，也就是說，我們構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不是為了和國家形成區隔，而是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所以說他的“愛國愛澳”的品質是深深的嵌入到他的每一個思考當中去的。第二個例子，是關於澳門學的問題。楊老師是澳門學的早期參與和推動者，但他自己很少提起這個。後來澳門學重新被提起來，他認為對於澳門學可以去建構或者是積極參與推動思考，但是他建議要低調。他認為雖然在學術界有一個敦煌學，相對於敦煌學而言，澳門學還沒有達到那麼足夠的積累程度，所以要去推動澳門學，還需要更加審慎的論證。他始終希望能够在整個國家建設當中，給澳門找到一個獨特的或者說是特定的生存之道，但是他希望仍然是是在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大格局之下的一個思考。

另外，關於“一國兩制”的國際化推廣方面，其實楊老師做了一些工作。我記得2013年國際憲法學會，當時是中國社科院的莫紀宏老師承接下來了，在我們國家舉辦。當時主會場就放在了西安，除主會場外，還有一個圓桌會議，就放在澳門。楊老師拍板，由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承接這件事情。當時如何舉辦這種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其實並沒有甚麼先例，相對來講，專業性比較強。楊老師以敢試敢擔當的精神，圓滿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楊老師對“一國兩制”的國際化推廣，是有思考和貢獻的。

梁淑雯：我接過李燕萍老師剛才說的最後一點。補充一句，《“一國兩制”研究》其實出版過4期英文版和葡文版，是在他主持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中心工作的時候。雖然這些都是一些翻譯的文章，但是他堅持“一國兩制”理論研究成果應該有一定的渠道推向世界，他是這麼認為的，也是這麼堅持在做這件事情。

冷鐵勛：我記得我們在中心的時候，楊老師反覆講的最多的兩條要求：一是你選擇了做學問這條路，就要準備吃苦，不能有享樂的想法，否則就不要來；二是作為學者要出精品，要精益求精。這兩條我至今都記得非常清楚，也是終身受益。說實話，我覺得楊老師他就是為“一國兩制”而生，他也是在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征途中離開我們的，但是他留下來的那些寶貴的學術思想，包括其中的觀點，都值得我們反覆學習領會。我根據吳主席要求，梳理了楊老師的學術思想，把他的著作和文章再重新又學習了幾遍，覺得楊老師就在我身邊，我在跟他對話，真是這樣的感覺。今天大家參加這個活動，感想確實很多。楊老師確實以個人的膽識和深深的洞察力提出的很多觀點判斷，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把握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為我們從事“一國兩制”研究提供了豐富和寶貴的思想素材。

陳海帆：謝謝兩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教授，以及澳門學者同盟的專家學者和各位嘉賓。非常感謝今天有機會，能够受澳門學者同盟的邀請來參與。這次的座談會也讓我和大家一起懷念楊允中教授的一生。我在這裏肯定可以說是認識楊允中教授時間最長的人了，從小就受到他對我們的關懷。最深印象的就是1976年在北京我們與他一家度過了一生最難忘的假期。剛才大家的發言，把楊教授的一生從不同的角度組成了一個完整的画面，我受益良多。

楊教授他治學非常嚴謹，工作非常認真，對後輩悉心教導，循循善誘。剛才大家也談了很多實際例子。我從跟楊教授一起工作，一起編著大百科全書開始，我們對他工作認真嚴謹，不計較得失的工作態度就印象深刻，這對我今後在澳門的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楊教授一生都投入到經濟和法律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裏，為澳門的“一國兩制”事業，可以說是生命不息，工作不咎。

剛才大家都說他精力充沛，作為家人，我們知道他其實是體力的極度透支。家人很心疼，我們在聚會的時候，總是想方設法讓他多補充一點蛋白質。楊允中教授的這一生，為澳門的發展奉獻了他畢生的精力，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學術研究成果。我為自己有這麼一位長輩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驕傲。再次感謝各位老師，感謝各位對他的深情厚意。

[編輯：李燕萍]

“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探索者——楊允中

韓大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杰出校友、著名基本法學者楊允中先生於2024年6月23日辭世。一年後的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共同緬懷以學術為生命、為“一國兩制”理論研究與事業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學者——楊允中先生。作為來自母校的學者，我和胡錦光教授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向追思會的主辦單位表示感謝，並代表母校的師生向楊允中先生家屬表示慰問。一年前楊允中先生去世的噩耗傳來，我們母校的師生、學界同仁為失去一位熱愛“一國兩制”事業、充滿社會責任與勇於創新的學界前輩深感哀痛。在“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的新背景下，學習和研究楊允中先生關於“一國兩制”的學術觀點，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加深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有助於構建“一國兩制”自主的知識體系。

楊允中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學者，生前發表了近500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學術著作《“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一國兩制”與澳門成功實踐》、《論正確實踐“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一國兩制”實踐論》、《“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論回歸意義》、《澳門基本法釋要》、《我的“一國兩制”觀》等論著40多部、先後主持編撰大型學術期刊近100期、各級研討會論文集和研究報告逾60部。在“一國兩制”研究領域，他以學術創新精神，力求結合澳門“一國兩制”生動實踐，推動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與框架，為學界深入研究與思考“一國兩制”理論提供了有益的學術範式與方法論。楊允中先生關於“一國兩制”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廣泛的。其中，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在於提出並構建“一國兩制”理論框架與方法論，以體系化融貫“一國兩制”的範式、概念與學理。本文以楊允中先生的《我的“一國兩制”觀》一書為例，探討楊允中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

1993年60歲高齡的楊允中先生報考了許崇德先生的博士生，踏上博士求學之路。當時，楊允中已獲得暨南大學經濟學博士，並在澳門學界已有廣泛的影響，並參與國家和特區重大決策的制定過程。可以說，此時的楊允中先生已功成名就。但為了進一步深造“一國兩制”蘊含的重大學術價值，並系統地研讀“一國兩制”歷史、文本與實踐問題，他決定到許崇德教授名下學習憲法與基本法。他入學的研究方向是各國政治制度比較，從憲法學、政治學的融合視角研究“一國兩制”的相關問題。在他的培養方案中有這樣的記載：“針對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急需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的客觀需要，通過三年的憲法學專業知識的學習，具有綜合的科研能力，為澳門的法制建設貢獻才智，為澳門的穩定與繁榮，為祖國統一事業發揮積極作用”。楊允中先生在三年的讀博士期間，在導師的指導下，認真鑽研學術，完成培養方案，撰寫了《“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博士學位論文，並於1995年12月10日參加答辯。根據檔案資料，當時參加答辯委員會的專家有7名，著名憲法學家王叔文教授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答辯委員會決議高度評價楊允中先生博士論文，並

全票通過論文，同意建議授予楊允中博士學位。1996年1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授予其博士學位論文。如果沒有對“一國兩制”事業的熱愛與追求，不可能在60歲高齡讀博士學位；如果沒有對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化的學術使命，很難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堅持寫博士論文，並提出體系化的框架與命題。這一特殊的研究背景，使楊允中先生成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探索者與實踐者。

楊允中先生“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化的探索始於對“一國兩制”基本概念、範式與範疇的深入思考。他在“一國兩制”的研究中注重理論範式的科學性，關注概念的提煉與融貫性，澄清不同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界限。比如，他在“‘一國兩制’再認識”一文中，提出最核心的理論問題，即到底何謂“一國兩制”。他認為“一國兩制”是主流價值認知體系，包括：“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的一項基本國策；“一國兩制”的具體化是基本法；“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之一；“一國兩制”是特別行政區的一大發展優勢；“一國兩制”是嶄新的開放型認知體系；“一國兩制”是全方位的成功創新；“一國兩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最新成果；“一國兩制”是現代憲法學、政治學的創新發展標誌和核心內容。在探討“一國兩制”基本理論的論文中，他把知行合一、求同存異、和諧包容作為認知論的核心理念。對“一國兩制”理論的內涵，他概況為“六觀”，即國家主權觀、兩種制度整合觀、“澳人治澳”觀、高度自治觀、政策穩定觀、長期示範觀等。

對“一國兩制”方針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他在“關於推動‘一國兩制’體系化成熟化的思考”中提出：“一國兩制”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是生動實際的國情教育內容；“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創新；“一國兩制”是新型民主試驗田；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有巨大示範價值等。他較早地將“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加以結合起來，提升了“一國兩制”的理論高度。

楊允中先生較早地提出“‘一國兩制’是新型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命題，並論證了理論依據與制度框架。目前學界對“一國兩制”是否屬“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有爭議，而楊允中先生在2012年就提出這一命題，並構想了完整的學理框架。他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條件、有必要成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認為特別行政區既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時也是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一國兩制”作為成熟的理論體系，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權威性、影響力。

在“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述中，楊允中先生堅持歷史的整體觀，反對“碎片化”歷史觀，對實踐問題保持客觀、理性與辯證的立場，使整體性與體系化成為他學術研究的基本風格，為我們樹立了學術體系化的標杆。如針對“五十年”不變的機械性解讀，他明確提出“50年不變不宜機械地理解”，並運用鄧小平理論系統地論證“五十年不變”的辯證原理，明確提出“50年不變”是中國政府的莊嚴承諾，是寫入中英、中葡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之一，並明確“五十年後不變”的內在邏輯與原理。

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化方面，楊允中先生是最早提出“一國兩制”作為新型複合型交叉學科的學者之一，致力於構建基於“一國兩制”的新知識體系、學科體系與教材體系。他強調，“一國兩制”教學與研究有待系統化、網絡化、“‘一國兩制’理論是一部大書”、“特別行政區制度

是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產物”等。他特別強調，“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性、可行性要經得起社會現實的檢驗，其創新價值十分豐富，其啟迪意義十分深刻。

在“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方法上，他倡導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提出以憲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不同視角綜合研究“一國兩制”理論，實現方法論的綜合化與體系化。他認為，“一國兩制”是特別行政區的一大法制優勢，它令特區在偉大祖國關懷、支持下享有水漲船高之利，可以有效提升綜合競爭力，並保持旺盛生機與活力。

可以說，體系化是楊允中先生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學術風格與方法論，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積極推動“一國兩制”的學理化、體系化與精細化。楊允中先生曾表示，學習好、研究好、發展好香港基本法，是新時代學者的歷史使命，要堅持將“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研究與實踐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為兩地長期繁榮穩定打下紮實穩定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中，“一國兩制”理論是最具標志性的自主學術話語，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典範。我們要以學術話語凝練在“一國兩制”實踐中蘊含的哲理、學理與法理，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與世界各國學者交流，將“一國兩制”的學術話語推向國際社會，與國際學術話語銜接，進入主流的話語之中，為國際學術界認識、研究“一國兩制”提供學術範疇與經驗。

自主性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中，基於歷史的關照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自主體系的目標設定還是具體構成要素，都離不開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背景。比如，“一國兩制”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濃厚中國政治文化底蘊，同時又體現主權、和平、包容與開放精神的國家制度體系。中國共產黨在追求與捍衛人類文明價值的過程中，在沒有任何先例的背景下，開創“一國兩制”，使之成為世界公認的人類文明的成果，其意義已超越中國，具有國際性。對這一原創性的中國憲法制度的生動實踐，我們需要以中國的學術語言與學術話語，凝練學術命題，使之成為原創性的中國思考與中國實踐，並以學術話語探索具有解釋力與說服力的“一國兩制”理論範式。

在“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內地與港澳學者應積極挖掘“一國兩制”這一源自中華大地的嶄新的制度背後的歷史與理論邏輯，以“一國兩制”鮮活的實踐豐富世界公法學體系，在知識變革的時代，讓世界分享“一國兩制”所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與共享”的價值理念。楊允中先生為我們留下了“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寶貴的學術遺產，它將成為不斷變遷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後借用楊允中先生於2012年《我的“一國兩制”觀》自序中的一句話結束我的發言。他說“本人雖日益逼近生命周期末端，但自問對‘一國兩制’嶄新事業心存厚望、充滿期待，適當拓展觀察的視角與深度，繼續關注實踐‘一國兩制’的一些規律性認知，仍屬必要與可能”。這是他的學術座右銘，他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學者的使命、價值與擔當。

[編輯：李燕萍]

深切緬懷“一國兩制”研究的領航人

鄒平學

今天我們站在澳門這片承載着特殊歷史意義的土地上，心中滿溢對楊允中教授的深切追思。2024年6月23日，楊老仙逝，離開了他一生熱愛的澳門，永別了他為之奮鬥終身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事業。楊老是將畢生精力和智慧熔鑄於澳門的回歸、治理及融入國家發展的親歷者、見證者、實踐者，是享譽澳門經濟學界、法學界和高等教育界的辛勤拓荒牛和耕耘者，是我們心目中十分敬仰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學術研究的大家和長者。楊老以“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的品格，為我們樹立了永恆的精神標杆。

一、作為良師益友的楊老給我留下的珍貴記憶

楊老的學術視野很寬闊，在政治、經濟、法學多個領域深耕細作並碩果累累。但要說起我和楊老的結識與學術交往，還是緣自於共同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研究。楊老畢竟是澳門“一國兩制”理論和基本法研究的元老級開拓者、重要奠基人。今天回憶起與楊老的結識和交往，點點滴滴的記憶開始變得串聯起來、鮮活起來，楊老和藹可親的笑容容貌浮現於眼前。

我從2004年開始關注港澳問題，並陸續發表研究基本法的成果，後來有機會赴港澳進行學術交流，很早就認識了楊老。2005年左右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劉高龍教授邀請我去澳門大學給研究生授課，每次一周時間，授課之餘，我曾去澳大老校園內的澳門研究中心拜訪過楊老，從此就與楊老有了交往。2007年楊老主持籌建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需要物色和引進人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吳新平研究員那時正好也在澳門理工學院工作，吳老師極力鼓勵我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工作，還向我要了簡歷，向楊老作了推薦，楊老也希望我能來中心工作。但我那時是深圳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二級學科碩士點帶頭人，且正好開始招生，實在不便離開，就放棄了這個機會。但楊老對我的關心和支持，讓我一直銘刻於心。2008年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楊老擔任首任主任，隨後2009年他創辦期刊《“一國兩制”研究》，從這時開始，我和楊老以及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交往開始日益密切。我的論文《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範探析》就發表在《“一國兩制”研究》2009年創刊號上。

近20年來，我多次赴澳門，除講學、開展課題調研外，更多的就是應邀參加澳門舉行的學術活動。我印象中，我到澳門參加的學術研討會、論壇中，可能有2/3的活動能夠在會場見到楊老。回顧起來，這些年我應邀赴澳門參加學術活動可能有1/3是楊老擔任主任的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邀請的，即使是參加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澳門其他機構邀請的學術活動，大多也是可以見到楊老的，畢竟楊老在澳門的地位和影響力擺在那裏，任何與基本法有關的學術論壇能夠邀請到楊老，那都是主辦方求之不得的。而且我發現，楊老為人沒有架子，善解

人意，只要時間不衝突，他都是樂意為別人站台的。

從2009-2019年這十年間，我因為應邀赴澳門參加學術會議而作的很多會議論文，有17篇論文發表在楊老擔任主編的《“一國兩制”研究》以及收入了楊老和饒戈平教授聯合擔任主編的相關文集。按照時間順序，列舉如下：《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範探析》（發表於《“一國兩制”研究》2009年創刊號）；《澳門特區管治體制和管治效能的若干問題初探》（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8年出版的《澳門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與實施》）；《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基本特徵芻議》（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9年出版的《成功的十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港澳特區終審權的憲法學思考》（收錄在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9年出版的《“一國兩制”與憲政發展——慶祝澳門特區成立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的若干思考》（收錄在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出版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法制建設——大型學術研討會文集》）；《一國兩制的新發展 港澳繁榮的新優勢》（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1年出版的《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18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特區“陽光政府”建設述評》（收錄在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1年出版的《“科學施政與制度化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普選”定義淺析》（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2年出版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的善治之路》）；《略論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結構和權力關係》（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3年出版的《一國兩制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略論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法律地位及其決定因素》（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4年出版的《澳門回歸十五年：發展與改革——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1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書》（收錄在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4年出版的《“一國兩制”與澳門居民權利保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5年出版的《開拓一國兩制實踐新征程論文集》）；《抓住國家發展戰略機遇促進澳門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6年出版的《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可持續發展——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3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如何解讀中央強調的“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收錄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7年出版的《堅守“一國兩制”實踐的正確方向——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4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完善基本法實施的制度機制，切實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發表於《“一國兩制”研究》2019年第1期）。可以說，楊老長期關心和支持我的基本法研究，是我學術成長路上的引路人，更是我人生的良師益友。

因為我與楊老之間的密切交往，我所在的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與楊老主持的研究機構有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兩個單位之間的互訪交流很多，楊老曾帶領澳門學界的朋友造訪深大，我和我的同事也多次來澳門理工大學拜訪他。每一次見面都相談甚歡。兩個單位還合作主辦過學術會議，我和楊老合作主編了會議論文集《“一國兩制”實踐與基本法實施的澳門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特別值得感念的是，他擔任主編的刊物《“一國兩制”研究》發表了我們中心很多年輕學者的文章，對年輕人的學術成長提供了寶貴的支持。眾所周知，在內地發表基本法的學術論文很不容易，尤其是年輕學者發表論文更不容易，很多年輕學者的第一篇基本法論文就是在這本刊物上發表的。剛才吳志良主席說澳門很多學者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楊老擔任主編的《澳門研究》上發表，給他們的成長給予了彌足珍貴的支持和幫助。我

們每一個在與楊老交往過程中，都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和藹可親、他的長者風範、他的學者智慧，他那遠遠超出他年齡的矍鑠的精神、無窮的精力活力、矯健的步履，都給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和美好的回憶。

二、作為偉大的愛國愛澳者和著名學者的楊老給世人留下的美好印象

吳志良主席的深情回憶，給我們披露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楊老的一些重要貢獻。我想楊老具有幾個鮮明的標籤。這些標籤經過歲月的流淌，越來越亮麗。

第一，楊老是偉大的愛國愛澳者。楊老的一生，是愛國愛澳的典範。我們經常說，“愛國愛澳”好像很抽象，但楊老的學術論著、學術貢獻、社會活動、實踐貢獻，就是活生生的“愛國愛澳”的縮影，是十分具象的，豐滿高大的。他是和澳門這個城市的命運連在一起的。他是一位充滿家國情懷的智者。回望楊允中教授的一生，他始終以“服務國家、建設澳門”為己任。他視澳門為“第三故鄉”與“人生最後一站”，用對學術的執着追求，對社會的無私奉獻，對教育的悉心耕耘，對人才的關心厚愛，樹起了一座精神豐碑。如今，我們站在他傾注心血的土地上，當以行動繼承遺志：深耕“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在時代浪潮中繼續探索實踐的深度；弘揚文明對話理念，讓澳門成為聯通世界的文化與科研樞紐；銘記寄語擔當，將家國情懷融入代代學人的血脉。

第二，楊老是對澳門“一國兩制”研究和基本法理論體系具有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的學者，而且是具有跨界學術影響力的澳門學者。他擁有暨南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的雙重學術背景，以跨學科的深厚學養，在澳門研究的沃土上開闢了全新疆域。楊老是經濟學家，也是法學家，他能夠十分熟練地運用跨學科方法研究澳門問題，在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在社科領域發表論文逾500篇，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澳門特別行政區常用法律全書》等大型工具書，首次為澳門研究構建起系統的理論框架；編著《轉型中的澳門經濟》《“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等40餘部著作，在兩岸四地學術界引發深遠影響；主持編撰大型學術期刊近100期、各級研討會論文集及研究報告逾60部，他還推動創辦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創辦《“一國兩制”研究》刊物，組織很多次的學術活動。他以驚人的學術毅力，推動澳門社會科學研究從分散走向體系化。楊老的著作，如同他偉岸的身材，真正達到了著作等身的高度。

第三，楊老是身體力行的參與“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的親歷者。楊教授不僅是書齋中的思考者，更是澳門命運的積極塑造者，他是澳門著名的社會活動家。1999年澳門政權交接儀式現場，作為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的他，將那一刻譽為“永刻民族記憶的壯麗史詩”。他曾任第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專業功績勳章”，參與法律改革諮詢、法官獨立委員會等工作，為澳門發展建言獻策，讓法治精神深植澳門社會；參與發起創建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經濟學會、澳門學者同盟等多個澳門學術團體，凝聚社會力量，推動本地學者參與澳門學術研究；他率先提出“澳門作為‘一帶一路’中西文明樞紐”的定位，力主建立“一國兩制”博物館——這座他心中的精神殿堂，不僅是歷史記憶的載體，更是愛國教育的基地，為全球理解“一國兩制”下兩種制度的對話、互補與共生提供了

重要範本。今日我們在此共聚學術盛會，也正是對他“以澳門為窗，促文明互鑑”理念的最好踐行。

第四，楊老是無私扶持後學、支持幫助年輕人成長的可親可敬的長者。直至晚年，楊允中教授仍以“老驥伏櫪”的熱忱投身學術傳承。他推動創立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為青年學者打造學術搖籃；他受聘於澳門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高校，以“傳道授業解惑”的堅守，為內地與澳門搭建知識交流的橋樑。他曾說：“澳門是片充滿機會的蓮花寶地，每個人都是時代劇碼的主人公，都是台前幕後的參與者。”這句寄語，至今仍在激勵着年輕學人們勇擔使命。

三、楊老在澳門基本法研究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楊老仙逝後，有學者對他在各領域的學術貢獻做過總結。我這裏對楊老在澳門基本法研究學術史中的貢獻脈絡作一個不成熟的簡單梳理，由此可回溯楊老在這個領域的重要貢獻。

關於澳門基本法的研究脈絡，我曾經做過一個學術綜述，把它概括為四個階段：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初創起步”階段確定為1988-1993年，“穩步發展”階段確定為1993-1999年，“務實深化”階段確定為1999-2012年，“步入成熟”階段確定為2012-2017年。如此判斷的理據在於：1988年1月，中葡兩國政府互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同年9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並正式開始工作，1993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通過之前的研究成果不多，這不僅與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爭議甚少，過程平穩，也與澳門本地基本法研究人才匱乏，內地對澳門基本法的研究關注和投入不夠有關，故將這一時期定為“初創起步”階段；之所以將1993-1999年確定為“穩步發展”階段，是因為這一時期對澳門基本法的研究，主要任務是闡釋基本法的立法精神、立法意圖和立法背景，解釋、宣傳和普及基本法，讓社會正確理解和掌握基本法，確保過渡期澳門的各項制度的變化能與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達到平穩過渡的目標。¹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澳門基本法正式開始實施，這時“不僅需要進一步宣傳基本法，而且還要研究和解決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使基本法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面對實踐中的問題，面對不同的理解與爭論，基本法研究的範圍在擴展，研究的內容在深化，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樣化”²，故此階段可稱之為“務實深化”階段。之所以把澳門基本法研究步入“成熟階段”確定在2012年，是因為當年2月29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這是中央首次依據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及其有關解釋，根據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對澳門回歸以後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這個時間節點與香港政制發展在2012年得到實質性的進展不約而同。結合這個時段湧現的大批量研究成果以及全國性的港澳基本法及港澳研究學術研究團體先後成立等標誌性事件，判斷基本法的研究在此時步入成熟階段，理據是充分的。

¹ 參見駱偉建、王禹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基本法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頁。

² 參見駱偉建、王禹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基本法卷》，第3頁。

我發現，楊老的學術貢獻是從第二個階段開始凸顯的。在第一個階段，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初創起步”階段（1988-1993年），1988年澳門基本法開始起草到1993年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期間，產生了可能是最早若干本針對澳門基本法問題進行研究的論著³，其中的代表作是蕭蔚雲主編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基本法研究“起步階段”的時間跨度相較香港為短，這主要是因為起步早於澳門基本法的香港基本法研究及其成果對於澳門基本法研究具有理論借鑑與指導意義，先期起草香港基本法所積累的經驗和立法技術對澳門基本法的起草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第二個階段，澳門基本法研究的“穩步發展”階段（1993-1999年）。楊老的論著開始問世並產生影響。在澳門基本法通過後到回歸前的過渡期，一系列的論著陸續問世⁴，代表作有：蕭蔚雲著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蕭蔚雲著的《澳門基本法講座》（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王叔文主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許昌著的《澳門過渡期重要法律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等，楊允中教授撰寫的《澳門與澳門基本法》（澳門基金會，1994年）、《“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澳門大學，1996年）赫然在列，這是他較早時期的基本法研究成果。除了上述專門研究澳門基本法的著作外，這一時期亦有對港澳兩部基本法進行綜合闡釋或比較研究的，如許崇德主編的《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張虎著的《港澳基本法釋論》（台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藍天主編的《“一國兩制”法律問題研究（總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楊靜輝、李祥琴著的《港澳基本法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等。這些論著奠定了澳門基本法的理論研究基本框架，楊老在其中是十分重要的貢獻者。

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些從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角研究澳門問題的論著⁵，論題包括回歸前的澳門政治、澳門政制的沿革與發展以及過渡期的澳門政治、社會現狀及過渡期急需解決的法律當地語系化、公務員本地化與政制銜接等問題。這些成果為澳門基本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其中

³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編：《澳門基本法與澳門之未來》，台北：中華港澳之友協會，1992年；《澳門基本法文獻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3年等。

⁴ 如《中國簡況：澳門基本法誕生記》，新星出版社，1993年；楊靜輝：《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00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梁凡：《基本法九九講》，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澳門基本法問答集》，澳門：澳門大眾報有限公司，1995年；鄧偉平編著：《澳門基本法知識》，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鐘業坤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論略》，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楊靜輝等：《澳門基本法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楊允中：《澳門基本法釋要》，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主編：《澳門與澳門基本法》，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楊允中、張學森主編：《回歸前的思考〈澳門基本法〉頒佈五周年專題座談會文章匯編》，澳門：澳門大學學生會，1998年；楊允中：《論回歸意識》，澳門：澳門經濟學會，1999年；趙國強：《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ABC》，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1999年；蔡新華等：《話說澳門基本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楊靜輝：《澳門基本法釋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

⁵ 余振編：《澳門政治與公共政策初探》，澳門：澳門基金會，1993年；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沿革、現狀和展望》，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1993年；余振編：《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3年；李炳時：《澳門總督與立法會》，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魏美昌：《澳門縱橫》，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余振編：《雙城記——港澳的社會、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1998年；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香港：名流出版社，1999年等。

吳志良、余振等人的論著影響較大。

到了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務實深化”階段（1999-2012年）。這個階段是楊老對基本法研究學術貢獻大放異彩的時期。1999年12月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基本法》進入實施階段，這一時期澳門基本法研究從以往偏重於文本闡釋開始轉向回應基本法實踐問題，擴大了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這一階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別重視基本法的研究，投入大量資源宣傳普及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每年邀請兩岸四地的學者到澳門舉辦學術會議，並將會議論文匯集成冊出版⁶，這些文集論及港澳基本法特別是澳門基本法實施的基礎理論、重要原則與制度實踐。

本階段澳門基本法研究有了迅速發展，其標誌性成果表現在如下方面：一是一批重要專著出版，專著數量就達到了40多本⁷，其中很多本是楊老的著作。代表作有蕭蔚雲等編的《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基本法實施兩周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科技大學，2002年）和《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澳門科技大學，2005年）、楊允中的《一國兩制》（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2年）、楊允中著的《澳門基本法釋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務局，2003年修訂版）、王振民著的《“一國兩制”與澳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08年）、駱偉建著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實施》（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禹著的《授權與自治》（澳門濠江法律學社，200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辦公室編的《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10周年文集：1999-2009》（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廉希聖等著的《澳門司法制度與基本法實施：專題研究報告》（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吳志良著的《澳門政治制度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劉高龍和趙國強主編的《澳門法律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駱偉建著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楊允中的《“一國兩制”理論探析》（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等。

二是具有學術創見的專題性研究論著的問世，提升了基本法研究的學術水平。如蕭蔚雲著的《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提出論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觀點，即行政長官制是單一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政權形式。駱偉建著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實施》則全面深入

⁶ 如《基本法對澳門發展的保障——基本法與澳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澳門基本法實施兩周年紀念研討會文集》（2002年）、《國家安全與公民意識——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論文匯編》（2003年）、《依法治澳和特區發展》（2004年）、《依法治澳經驗與前瞻》（2005年）、《基本法：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保障——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13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可持續發展（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14周年及中葡聯合聲明簽署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澳門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與貫徹》（2008年）、《成功的十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16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第二個十年——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17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一國兩制”與澳門的善治之路——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19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等。

⁷ 如彭小燕編：《國家安全是“澳人治澳”基石》，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2年；楊允中：《論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楊允中：《“一國兩制”與國際競爭力》，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7年；鄧偉平：《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元元：《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分析》，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9年；王偉華：《澳門檢察制度》，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米健：《一國的保障——兩制的體現》，澳門：澳門科技大學，2009年；潘冠瑾：《澳門社團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李燕萍：《澳門的法院和審判制度》，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張德瑞主編：《澳門基本法導論》，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李燕萍：《濠江法治論衡》，澳門：澳門學者同盟，2012年等。

探究了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機制。王禹著的《“一國兩制”憲法精神研究》對港澳基本法上的國家行為和政治問題、澳門基本法對澳門法院管轄權的規定及其限制、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等問題做了深入研究。駱偉建、王禹主編的《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基本法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年）則是本澳學者對基本法研究的精品薈萃。饒戈平主編的《燕園論道看港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對香港的對外法律事務及其制度、澳門特區政制發展與法律改革、港澳共同面臨的法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三是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不遺餘力地推動基本法研究，成為澳門基本法研究重鎮。這其中楊老的貢獻居功至偉。該中心2009年創刊《“一國兩制”研究》學術刊物，辦刊宗旨期以全方位視野探討“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相關議題，理論與實務並重，建立關於落實“一國兩制”原則的策略資料庫。該中心從2009年開始，出版一系列專著和論文集，其中“一國兩制”文庫系列就出版了50多本，當中楊老主編了數部文集⁸，代表性論著有：楊允中著的《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2009年）、張元元著的《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分析》（2009年）、王磊、甘超英著的《澳門回歸十年憲制發展研究》（2010年）、林園丁和張德榮合著的《澳門特區民主發展前景研究：以選舉制度為視角：專題研究報告》（2010年）、饒戈平著的《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問題研究》（2011年）、李元起和許崇德等著《〈澳門基本法〉解釋體制研究》（2011年）、莊金峰著的《繁榮穩定大局與“一國兩制”澳門模式》（2011年）等。

四是針對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與社會的高速發展，政治領域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一批政治學、社會學論著圍繞新時期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政制、政治發展與治理模式作了有益探討，如余振、余永逸、鄺錦鈞編的《雙城記II——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03年）、吳志良和陳欣欣著的《澳門政治社會研究》（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0年）、吳志良著的《舊區重整、社會建設與社會發展》（2004年）、婁勝華著的《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余振和林媛主編的《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等。這些代表作提出論證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例如，有的建議完善澳門現行的諮詢制度，有的探討了澳門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必要性及路徑，分析了澳門特區政府施政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變革問題。

在第四個階段，也就是澳門基本法在2012年步入成熟階段，從2012年到楊老2024年去世這個階段，楊老持續發力、寶刀不老，不僅熱情組織了很多在澳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論壇，還持續主編出版會議文集、主編刊物。其步入成熟的標誌表現如下：

⁸ 楊允中等編：《“一國兩制”澳門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楊允中等編：《“一國兩制”與憲政發展——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楊允中等編：《“陽光政府與公民社會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姬朝遠等：《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保障研究》（2011年）、梁文慧等：《澳門居民基本權益保障研究：專題研究報告》（2011年）、莊金峰：《繁榮穩定大局與“一國兩制”澳門模式》（2011年）、林園丁等：《“一國兩制”文化與澳門和諧社會研究》（2011年）、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2011年）、常江、張梓軒：《“一國兩制”下澳門廣播電視業發展路徑研究》（2012年）、樊建民等：《澳門與內地合作打擊賄賂犯罪問題研究》（2012年）、宋錫祥、莊金峰等：《“一國兩制”與中國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2012年）等。

(1) 基本法的專題化研究不斷拓深拓展，學術探討日漸精深，為形成基本法理論體系提供了豐碩的成果支撐。

澳門基本法專題化研究向縱深發展。這些成果主要有趙向陽著的《澳門選舉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冷鐵勛著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制度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王禹編的《澳門立法技術討論文集》（澳門濠江法律學社，2013年）、陳海帆著的《澳門的居留及身份認別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史彤彪著的《“一國兩制”下內地與澳門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3年）、麥瑞權等合著的《澳門社團參政問題研究》（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3年）、龐嘉穎著的《一國兩制與澳門治理民主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孟慶順著的《澳門廉政制度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黃湛利著的《澳門公務員制度》（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趙琳琳著的《澳門司法制度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張雪蓮著的《澳門教育制度與受教育權保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米健著的《澳門發展中的法治利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劉倩著的《澳門行政主導體制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蔡永君著的《轉型時期的澳門政治精英》（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任進著的《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還有一些通過全面資料統計和社會經濟實證經驗總結的論著，從一個側面對澳門基本法實施的成就作了很好的註腳，如陳嘉賢著的《澳門回歸中國十五年的回望：與中國香港和新加坡資料比較給出的啟示》（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年），它們不僅比較了港澳基本法的異同，還以大量不同領域的資料統計分析展現了澳門回歸後的成就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吳志良、郝雨凡等編著的《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5-20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不僅有專門分析政治法制方面的發展，還對經濟貿易、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社會文化方面的進行客觀分析。此外，在本階段澳門基本法學界仍繼續藉由研討會論文集的形式批量地推出研究成果的合集。楊老在此的貢獻十分卓著。⁹ 如楊允中主編了系列研討會的文集：《“一國兩制”與澳門法律體系完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3年）、《基本法與2013澳門立法會選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學者同盟，2013年）、《澳門回歸十五年：發展與改革——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1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4年）等，楊允中和饒戈平主編的《開脫“一國兩制” 實踐新征程——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2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5年）、楊允中和鄒平學主編的《“一國兩制” 實踐與基本法實施的澳門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等。

(2) 基本法連續出版物批量出現。學科類論叢或綜合性評論系列叢書的出現是一個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2010年，許崇德主編、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一國兩制”知識叢書正

⁹ 如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法律體系完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3年；楊允中主編：《基本法與2013澳門立法會選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學者同盟，2013年；楊允中、饒戈平主編：《澳門回歸十五年：發展與改革——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1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4年；楊允中、饒戈平主編：《開拓“一國兩制” 實踐新征程——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2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15年；楊允中、鄒平學主編：《“一國兩制” 實踐與基本法實施的澳門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等。

式推出。¹⁰此外，周葉中、鄒平學主編的《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論叢》¹¹、饒戈平和王振民主編的《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論叢》¹²、鄒平學主編的《港澳基本法實施評論》¹³、周葉中總主編的《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系列》¹⁴，鄒平學主編的《港澳制度研究叢書》¹⁵，這些叢書的出版，極大推進了基本法研究專題化的廣度和深度。

(3) 不同形式的基本法研究刊物不斷出現。¹⁶反映學科步向成熟的另一重要標誌是有關專業研究刊物的湧現。雖然目前還沒有定名為基本法的刊物，但已有一些相關刊物，如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創辦的《當代港澳研究》¹⁷，2016年它入選南京大學CSSCI刊物。目前內地唯一的專門性港澳研究學術刊物《港澳研究》於2013年創刊，它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管、港澳辦港澳研究所主辦。¹⁸總體而言，目前有關的公開刊物還是太少¹⁹，為適應發展迅速的研究需要，一些公開刊物便開設相關專欄²⁰，在期刊資源受到嚴控的形勢下，這也不失為一種變通發展之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老擔任主編的《“一國兩制”研究》高度重視發表內地和港澳青年學者的論文，為吸引和培養他們進入這個領域發揮了重要扶持作用。

(4) 全國性基本法及港澳研究學術團體先後成立。2013年11月26日，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新成立的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是一個全國性的學術研究團體。2013年12月6日，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管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北京成立，這是在國家民政部註冊的全國性

¹⁰ 該套叢書由18部論述基本法各子領域問題的專著組成，除陳弘毅著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治軌跡》（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傅思明著的《香港特區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等專門針對香港外，亦包括了多部針對澳門基本法領域問題進行研究的專著。

¹¹ 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已出第一輯（2011年）。

¹² 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已出第一輯（2011年）、第二輯（2013年）、第三輯（2016年）。

¹³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已出2014年卷總第1卷（2015年）、2015年卷總第2卷（2016年）。

¹⁴ 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已經出版易賽鍵著的《香港司法終審權研究》（2013年）、黃振著的《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研究》（2013年）、朱孔武著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特權與調查權研究》（2016年）。

¹⁵ 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現已出版十種：郭天武、陳雪珍、嚴林雅著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權與終審權問題研究》（2021年）、陳雪珍著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審查制度研究》（2021年）、黎沛文著的《政黨法論：基於香港的視角》（2021年）、張淑鈚著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非全職法官制度研究》（2021年）、鄧達奇著的《香港基本法解釋權研究》（2021年）、任珺著的《身份認同與香港文化政策研究》（2022年）、周挺著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重大傳染病事件行政應急制度研究》（2023年）、何建宗主編的《香港基本法實施以來的十大議題：回顧與前瞻》（2024年）、江連著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功能界別選舉制度研究》（2024年）、朱立宇、彭君著的《澳門立法轉型研究》（2024年）。

¹⁶ 香港和澳門回歸前後都創辦有不少刊物，其中一些法律期刊和社科綜合期刊也經常登載研究基本法問題的論文。目前香港主要的法律期刊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1971年創刊的《香港法律學刊》（*Hong Kong Law Journal*）；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1992年創刊的《亞太法律學刊》（*Asia Pacific Law Review*）；香港律師會創辦的《香港律師》（*Hong Kong Lawyer*）；澳門學術機構、政府機構、社團編輯發行了《澳門研究》、《澳門法學》、《九鼎》、《法域縱橫》、《行政》、《“一國兩制”研究》、《基本法研究》、《澳門理工學院學報》等刊物。

¹⁷ 該刊係以書代刊的學術集刊，按季度出版，於2009年創刊，前身是創刊於1993年的《當代港澳》。

¹⁸ 值得一提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2005年創辦的內刊《港澳研究》刊發了大量基本法研究論文，在業內頗受關注。在同名公開刊物創刊後不久，該刊已經停刊。

¹⁹ 中國法學會2013年5月創辦有《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內刊），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也創辦有不定期印發的內部研究通訊之類的內刊。

²⁰ 如《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自2013年開設“港澳研究”專欄，《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自2014年開設“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專欄。

民間學術社團，以統籌、協調“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加強港澳與內地相關領域學術交流合作為宗旨，發揮民間智庫功能。這兩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的成立，表徵了基本法研究學術共同體的發展壯大，可謂基本法研究步入成熟的又一重要標誌。

(5) 基本法方面的專業網站、學術網站、微信公眾號日漸增加。適應網絡時代的發展需要，基本法研究的成熟度也體現在網絡世界。目前有代表性的網站有：由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策劃的《基本法》案例資料庫²¹、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與港大圖書館聯合開發的香港基本法草擬過程資料庫²²、香港特區立法會資料檢索網站²³、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設立的電子版香港法例²⁴、澳門特區立法會網站²⁵、澳門特區政府法務局憲法與基本法專題網站²⁶、澳門特區政府法務局主辦的澳門法律網²⁷、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與深大圖書館聯合開發的基本法專題資料庫²⁸。有關學術團體和基本法研究機構如中國法學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廣東省法學會港澳基本法研究會等，均開設有官方網站及微信公眾號，其內容更新十分迅速，是重要的基本法研究網絡資源。

(6) 基本法的學術交流與研討活動蓬勃開展，基本法研究的智庫功能明顯增強。這一階段，境內外的基本法學術研討活動舉辦頻率越來越高，形式越來越多樣化，研討品質水平也不斷提升。這已經成為促進港澳與內地學術交流、激發學術爭鳴、薈萃學術成果的重要平台。與此同時，適應國家高度重視發揮智庫功能的需要，眾多基本法學術團體、專業研究機構和基本法學者也奉獻了不少內部諮詢服務報告，明顯增強了基本法研究的實踐功能。

最後，我要結束我的發言。我想借用楊老生前曾經說過的這段話：“當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沒有錯失這寶貴的機遇。’”當我們回顧追思楊老的一生，他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澳門和國家。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先生之志，永續傳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楊老的精神永存！

[編輯：陳慧丹]

²¹ 《基本法》案例資料庫：<http://www.basiclawcourtcase.gov.hk/tc/home/index.html>。該網站收錄回歸以來的部分以《基本法》作為基礎進行申請的訴訟案例。

²² 香港基本法草擬過程資料庫：<http://sunzi1.lib.hku.hk/bldho/home.action>。目前有四個數據庫可供公眾免費使用。“DRAFTING MATERIALS”存放了1985-1990年間起草和頒佈的《基本法》和1990-1997年間由各種官方機構和個人編制或使用的為恢復主權而準備的近900份文件。“NEWS COVERAGE”提供關於1985-1990年間各官方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報刊文章。“LEGCO DATABASE”收集香港立法會從1986-1991在基本法及其起草過程中的相關爭論。“TEXTUAL HISTORY”包含了《基本法》中每一條的各種草案版本，以及可用的官方評註。

²³ 香港特區立法會：<http://www.legco.gov.hk/guided-search/chinese/guided-search.html>。

²⁴ 電子版香港法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²⁵ 澳門特區立法會：http://www.al.gov.mo/cn_cn_main.html。

²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澳門基本法專題網站：<https://www.basiclaw.gov.mo/web/zh>。收錄憲法、澳門基本法及相關法律條文、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歷史文獻、圖片資料、會議論文等。

²⁷ 澳門法律網：<http://www.macaulaw.gov.mo/cn/index2.asp>。

²⁸ 港澳基本法專題資料庫：<http://basiclaw.szu.edu.cn/>，2013年創建，按照基本法的章節條文內容，共設置118個研究專題，涵蓋港澳政治、法律、歷史、人文、社會、經濟等內容，截止到2025年9月，容納信息近50多萬條。

楊允中“一國兩制”學術思想回顧

冷鐵勛

楊允中教授是我國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領域享譽兩岸四地的著名學者，也是我國“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研究的重要領航人和開拓者之一。楊允中教授心繫祖國、心繫澳門，親身參與了澳門基本法起草的諮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組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建設工作，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第九及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任和第二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政府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和經濟委員會委員，為澳門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以及澳門特區的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楊允中教授以求真務實、嚴謹認真、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以及過人的膽識和深邃的洞察力，主持編撰了涵蓋百科全書、“一國兩制”和法律範疇的多種大型工具書、叢書、期刊等，並出版、發表了40多部學術論著以及逾500篇論文，成就卓著，在海峽兩岸四地富有影響力，在推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並對澳門研究和澳門學的發展奉獻了聰明才智。為表彰楊允中教授的突出成就，繼2003年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頒授其專業功績勳章後，2019年楊允中教授成為第一批獲得“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傑出貢獻獎”學者。這是對楊允中教授為“一國兩制”理論的體系化，特別是為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所作貢獻的充分肯定。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也進入了新階段。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使命。適應“一國兩制”實踐在新時代的重要使命要求，全面梳理楊允中教授的“一國兩制”學術思想，對於完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並更好指導“一國兩制”實踐，不斷譜寫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新篇章具有重要意義。

一、致力推動“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建設

理論是實踐的燈塔。“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離不開“一國兩制”理論的指導。自從“一國兩制”構想提出特別是中國政府將其確定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以來，港澳台與內地的學者緊緊圍繞“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中的重點難點，深入研究問題的本質與根源，不斷提煉和深化規律性認識，努力探索破解之道，致力建構一套適應“一國兩制”要求、以憲法和基本法為核心、符合特別行政區實際的理論體系，更好地指導“一國兩制”實踐。其中澳門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聯合內地、香港等地的研究力量，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持續加強“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在“一國兩制”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係、“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特別行政區制度與國家管理制度的關係、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探索和思考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推進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論支撐。這當中走在最前列的有一位老人，他就是可以稱之為“老驥伏櫪”的楊允中

教授。楊允中教授不僅身體力行地從事“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研究工作，還推動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專門研究“一國兩制”的學術機構即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創辦了全國第一份也是目前唯一的以“‘一國兩制’研究”為名稱的學術刊物即《“一國兩制”研究》。此外，楊允中教授還主編出版了全國第一部《“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主持創建了“一國兩制”文庫，至今已出版了51本書籍，其中楊允中教授的專著《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我的“一國兩制”觀》（後又出版《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一國兩制”理論縱橫》、《“一國兩制”實踐論》均收入其中。這些著作充分反映出楊允中教授對“一國兩制”這一嶄新事業的無限熱愛和對“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不懈追求，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更是從事相關領域研究非常寶貴的素材和參考。

（一）系統闡述“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

“一國兩制”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²⁹正是在“一國兩制”理論指導下，中國政府通過與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和平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並於1990年4月4日和1993年3月31日分別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香港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且於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中國人民長期以來收回香港和澳門的願望。對此，楊允中教授認為，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兩部基本法的生效實施，是“一國兩制”理論賴以定型並成熟化的標誌性事件，說明“一國兩制”的科學性和生命力得到令人信服的檢驗。他認為“一國兩制”理論博大精深，極具深度開發、充分利用價值。結合自己的觀察與思考，楊允中教授系統論述了“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與學科歸屬。

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楊允中教授認為包括六個方面：

一是國家主權論，即堅持一個中國理念。國家對港澳先後恢復行使主權並令其同國家主體部分保持同步繁榮穩定，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二是兩制共存論。在國家主體部分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在局部地區靈活實行該地區原有社會制度是有利有益的，從而使兩種制度的優勢在特區得到合理整合，形成優中有優、強中有強。

三是“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論。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表明特別行政區公權力的行使以本地人特別是本地人中的中國公民為主體，這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後的一個特殊要求，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尊重本地人首創精神和人格尊嚴的創新制度安排。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就令人信服地證明，澳門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澳門。

四是高度自治論。除直接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國防以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外，特區公權力幾乎在其他領域都可有效行使管轄權，在司法領域更可行使終審權。這是至今實行地方自治的最新做法、最高水準。最關鍵的一點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²⁹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頁。

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五是政策穩定論。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經法制化的這項政策指引亦屬中外歷史所罕見，而且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勢是“一國兩制”現在是不應該變，以後是不需要變。其宗旨、目標就在於科學地認定形勢特點前提下使“一國兩制”這一體現當代文明最新成果的制度創新得以不受干擾地貫徹始終，取得全面成功。

六長期示範論。充滿生機活力的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既有力地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寬鬆和諧，又積極促進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已成為觀察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並逐步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晴雨表和指向儀。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隨即走上驗證“一國兩制”新征程，作為國家的兩顆掌上明珠必將進一步散發出奪目光彩。³⁰

楊允中教授的上述精闢論述，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理論的豐富內涵和及其內在邏輯關係，為豐富和完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提供了有益啟示。

(二)科學分析“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歸屬

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歸屬，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是認識論、方法論的一大突破。考慮到“一國兩制”不僅是對人類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不僅是憲法學、行政法學，而且是法理學等各個法學領域）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也是對經濟制度和經濟學理論、哲學思想和人的思維方式等都提出了重大挑戰³¹，他認為越來越清晰的一點是，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規律；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為此，楊允中教授呼籲，無論從研究對象與範圍的廣闊性、明確性觀察，還是從形勢演進的挑戰性、風險性判斷，盡早就“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定位作出恰如其份、符合實際的定性認知，完全必要和必須，有益也有建設性。對於特區學者和全國相關領域的學者來說，也都是一項迫在眉睫的現實課題。對此，他提出“一國兩制”是一個大理論、大學科，它首先是憲法學研究的主題，同時也是一個呼之欲出的複合型學科，把它定位成“一國兩制”學（包括“一國兩制”法學、“一國兩制”政治學、“一國兩制”社會學、“一國兩制”經濟學、“一國兩制”哲學等等）完全可行，給它取個較為通俗的“共贏學”（互贏學、多贏學）名稱亦未嘗不可。他相信，形勢發展將可能證明，這個創新型學科對現有人類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結構與內涵設定帶來的是一場革命性優化與促進，並會受到國內外越來越多學科與學者的普遍認同與支持。³²

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理論產生於當代中國，“一國兩制”又實踐於當代中國。“一國兩制”作為多重創新的積極成果，應該開始進入其豐收期，它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展現的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將逐步改寫現有政治學、法學以及政府管理等領域的一系列傳統定勢與價

³⁰ 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縱橫》，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4年，第55-57頁。

³¹ 喬曉陽：《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偉大意義》，許崇德：《“一國兩制”理論助讀》，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序。

³² 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縱橫》，第59-62頁。

值判斷。這中間涉及“一國兩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考證，也涉及對“一國兩制”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科學認定，還涉及對“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的探索等十分突出重要的課題。作為“一國兩制”發源地的中國包括兩個特別行政區相關領域的當代專家學者，在這一系列事關國家核心利益也事關對新學科建立、新學術活動陣地的認定的大方向大原則上，不容掉以輕心，不容觀望等待，不容無動於衷。³³

事實證明，楊允中教授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且富有前瞻性。隨着“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加強“一國兩制”理論尤其是基礎理論的研究，以構建符合時代需要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顯得越來越重要和緊迫，而這些都離不開對“一國兩制”理論進行精準的學科定位。

(三)著力提升“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科學認知

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列入國家基本國策是名至實歸。它既是政治上充滿智慧的高端決策，也是法制上的成熟型創新成果；既是中西文化上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思維的集中展示，也是哲學上知行合一、對立統一認識論的新發展。特區官員、居民以至全國人民都有責任提升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科學認知，這就要求我們集中學術力量並投入必需資源作好開拓性研究。結合港澳回歸以來實踐“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他認為“一國兩制”是特區最大的發展優勢，這個優勢同原有優勢合理整合會令特區如虎添翼，就有條件和可能創造出改變歷史的發展成果。從現有理論和特區實踐，楊允中教授認為，人們已經不難作出認定，“一國兩制”絕不是權宜之計；“一國兩制”絕不是消極防範；“一國兩制”絕不是可有可無、可上可下、可興可廢；“一國兩制”更不是落後思維、向資本主義讓步的產物。作為大思維，它的生命力、優越性剛剛啟動；作為大決策，它的成效剛剛得到凸顯；作為大理論，它必將在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以至哲學等領域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作為這項大思維、大決策、大理論發源地的中國，特別是身臨其境、身體力行驗證其實踐的特別行政區官員、學者、居民，更應當仁不讓提升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科學認知，認認真真地推動相關理論的系統化與完善化。³⁴

為幫助人們提升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認知，楊允中教授強調應多元多角、多域多維進行觀察、思考、探索，並列出幾項常用切入方法：

一是知行合一觀，知行統一、知行兼程、知行共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理論靠實踐驗證也靠實踐補充完善；

二是求同存異觀，大同小異、同中有異、化異為同、互利共贏；

三是開放開明觀，把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吸引進來，為我所用；也要開誠佈公、透明寬鬆、包容和諧；

³³ 楊允中、黃來紀、李志強主編：《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44-45頁。

³⁴ 楊允中：《“一國兩制”實踐論》，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第270-271頁。

四是對立統一觀，要掌握事物發展主動權，就要設法認識矛盾轉化規律，就要學會並善用辯證法。要力爭轉弱為強、化被動為主動，令劣勢此消彼長、優勢此長彼消，積極尋求願望與利益的最大公約數。³⁵

根據香港澳門回歸以來的“一國兩制”實踐，楊允中教授認為，在“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認知方面，應得到以下越來越清晰的解讀：

其一，“一國兩制”是當代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國策，其驗證成效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和全民根本利益，是“一國兩制”最具代表性、最典型、最現實的集中展示；

其二，“一國兩制”是推動國家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安排；

其三，“一國兩制”與國家主體部分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步構成殊途同歸、異曲同工，是現代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義合理存在的前提下對其利用、改造、駕馭，使之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成功演練；

其四，“一國兩制”是符合當代特別行政區居民意願、利益與要求，同時也代表全國各族人民長遠利益與共同期盼的關鍵性舉措；

其五，“一國兩制”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重大突破，因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確而必然的選擇，是益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創造性決斷。

(四)深入思考推進“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

楊允中教授多次提出，應不失時機地推動“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化細化、普及化，提倡更多人士參與相關領域的推介和研究，進而推進“一國兩制”理論的系統化和成熟化。³⁶ 為此，楊允中教授還積極呼籲“一國兩制”學進高校、入課堂，內地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高等學校要在“一國兩制”這個新型學科方面加大資源投入，將“一國兩制”的教學與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網絡化等高科技手段，深化“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對此，楊允中教授滿懷期待，並認為加速開發

“一國兩制”理論的豐盛資源，可令特區學者和中國學者捷足先登、大展拳腳、大有作為。³⁷ 他深信，“一國兩制”理論經港澳兩部基本法的法制化規範化，經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多年的實踐積累，已經成為現代憲法學、政治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是植根於中華文明的一項理論突破，這也是令中國人引以為榮、令世人為之震驚的一大制度創新。深入系統地研究“一國兩制”理論及其實踐規律，是當前擺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前有待全面加強的一個核心課題。³⁸

楊允中教授不僅積極去引導加強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認知和研究，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寫出了一篇又一篇非常有份量的文章，反覆強調開展“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如：收入《我的“一國兩制”》（增訂版）一書的《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研究》、《“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一國兩制”與

³⁵ 澳門學者同盟：《改寫歷史的二十年》，澳門：澳門學者同盟，2020年，第12頁。

³⁶ 吳志良主編：《改革開放與澳門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0-11頁。

³⁷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33頁。

³⁸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19-20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文章，大力倡導並推動“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並認為這已經成為特別行政區正常發展並保持繁榮穩定的一項常態要求。同時，楊允中教授表示，“一國兩制”對中國和國際法學界、政治學界提出了全新研究課題，不僅對於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對政治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並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新經驗、新方法，具有現實的國際意義。它屬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嶄新內容和理論突破，是政治學探索與研究的一項具有歷史意義和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成果，也是現代憲法學和政治學研究的全新課題和重要組成部分。³⁹

此外，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最具中國特色的理論創新成果，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思維的大突破和理論的大發展。它不僅深深地影響到現有人文社會科學基本結構和學科體系的佈局，而且也令現代認識論更具開放性、創新性；不僅業已構成一個嶄新的學科理論體系，而且正在指引新型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成功運作。⁴⁰ 另外，他還提出，不能把某些理論成果絕對化、簡單化、表面化，而是要持續走出一條探索、求實、創新之路。⁴¹ 楊允中教授的這些真知灼見，對於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並進而提升“一國兩制”理論的認知水準以及推進“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深刻總結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經驗

要提升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離不開對“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總結。“一國兩制”在澳門的豐富實踐，給我們留下很多寶貴經驗，也留下不少深刻啟示，非常值得我們珍惜，更值得我們總結，特別是富有澳門特色的那些好的、有效的或者管用的做法非常有必要認真總結。楊允中教授特別注重並強調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經驗進行總結，不僅親自撰寫有關深刻總結“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經驗的文章和著作，還結合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系統論證“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

(一) 強調總結自身實踐經驗要有自覺性

楊允中教授認為，澳門回歸後，由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澳門居民已成為新制度的實踐者和受益人。和時代同步前行的澳門居民，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和理解應保持一個很高的水準，對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與生活要倍加珍惜，因而對總結實踐經驗也要保持理性的配合。為此，他提出衡量一項制度的實施是否進入成熟化有兩點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在這項新制度下經濟與社會發展是否有明顯起色，居民基本權益是否有全面保障；二是從政府到民間作為推行新制度的行為主體其行動是否自覺化，其思考是否理性化。按照這兩項標準，楊允中教授認為，大量事實無可爭議地表明，澳門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開埠以來最好時期，反覆進行的民意問調顯示，居民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和對現實生活滿意度居於較高層次。新制度的成功驗證與居民心理調整和強化提升保

³⁹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343-344頁。

⁴⁰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99頁。

⁴¹ 楊允中等著：《“一國兩制”理論探析》，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258頁。

持同步上揚，符合發展規律。⁴²

(二)提出認定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八項基本要求

為促進更好理解“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楊允中教授提出了八項基本要求以供參考：

(1) 國家恢復行使主權，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憲法、憲制受到高水準的尊崇與實施。(2) 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3) 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4) 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5) 治澳澳人“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6) 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7) 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常態要求。(8) 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取得具可比性成效。⁴³

(三)充分肯定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在澳門回歸15周年之際，楊允中教授對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形象地用“兩大”、“兩新”、“兩高”、“兩有”八個字來概括。經濟領域是“兩大”：總量大擴充、民生大改善。政治領域是“兩新”：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新型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和堅持“以人為本、依法施政”新施政理念。以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有序推進為代表的新興政權建設和以“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深入系統宣傳推介為代表的公民意識提升，構成澳門特區政治參與的兩道風景線。社會領域是“兩高”：高穩定度、高和諧度，求同存異、寬鬆包容、海納百川、和氣生財。文化領域是“兩有”：綜合素質有新提升，核心價值觀有所調整，“一國兩制”、“愛國愛澳”成為新型價值觀首選。

在肯定成就的同時，楊允中教授認為，發展空間制約、產業單一、競爭意識不足、創新思維不夠、對深層次矛盾的預判和防範缺位等，仍是澳門特區發展的短板，不容忽視。但該肯定還要充分肯定。澳門特區新風尚新氣象舉目可見，這是改寫歷史引發的深刻變化，這是文明進程加速的積極成果，這是“一國兩制”創新實踐的成功示範。⁴⁴

結合自身對澳門回歸20年“一國兩制”的實踐觀察，楊允中教授認定“一國兩制”長達兩個十年依法施政期的實踐成功，澳門當仁不讓：政治上，澳門走出一條正確理解、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軌跡，澳門本身就是一個“一國兩制”現實陳列館；經濟上，澳門是全球最佳發展指標的創造者之一，受到重要國際組織肯定；文化上，澳門是“愛國愛澳”新型價值觀載體及新理念、新思維孵化器；社會上，澳門保持持續穩定，是寬鬆、和諧、包容、自強的有效指向器。當然，澳門尚存諸多有待完善的短板和不足，但這是前進中的不足、成長中的不足。⁴⁵

(四)系統論證“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

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作用獨特。楊允中教授結合自身經歷澳門歷史性變革的30多年歷程的感同身受，從澳門自身的特殊性出發，把澳門回歸祖國前後的過程與內地改革開放

⁴² 楊允中等：《“一國兩制”理論探析》，第236頁。

⁴³ 楊允中：《兩個20年：當代中國與當代澳門》，《“一國兩制”研究》2019年第4期，第39頁。

⁴⁴ 楊允中：《奠基、拓展、攀登——澳門特區第一個十五年“一國兩制”實踐》，《“一國兩制”研究》2014年第4期，第3頁。

⁴⁵ 楊允中：《兩個20年：當代中國與當代澳門》，第39頁。

的歷程相聯繫，並把澳門特區的發展置於祖國的大發展之中進行觀察，對“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模式作了系統思考和論述。

首先，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進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了闡述。楊允中教授認為，香港和澳門各有特色，各自精彩，在實踐過程中存有差異也完全正常，正是這種特色和差異導致了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自身模式。當然，澳門實踐“一國兩制”之所以能形成自身的模式，最關鍵的還是“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離開了這一前提，也就不存在甚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了。而探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或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應該說，既有理論的必要性，又有現實的可行性。⁴⁶

其次，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立論前作了分析。如何對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進行總結和探索，這在學術界是有不同意見和爭論的，如有的學者認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應該只適應於澳門，其內容不能包括香港的經驗和做法。對此，楊允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確立“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時當然要區別香港和澳門的不同情況，但也不應完全拘泥於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做法的同異上，而應從“一國兩制”實踐的內在本質要求去考慮分析。為此，他認為研究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應堅持五大前提、區別五個不同、遵循五個原則。堅持五大前提是指堅持：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維持長期繁榮穩定；以本地整體利益為判斷標準；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和平發展。區別五個不同是指區別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以下不同：歷史演變背景、文化積澱與影響力不同；法制、正式語文不同；經濟實力、發展空間不同；社會發育程度不同；社情民意不同。遵循五個原則是指遵循以下原則：劃分高度自治範圍與界限，有信心正確實踐“一國兩制”；面對澳門微型社會、微型經濟現實；強調自主開拓、擺脫慣性依賴；善用“水漲船高”效應；發揮“中國特色”與“澳門特色”的雙重特色效應。⁴⁷

再次，就“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基本內涵進行了深度闡述。對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具體內容，學者間的理解不盡一致。對此，楊允中教授認為，在澳門實踐“一國兩制”雖已取得巨大成功，但要對其作出比較準確和公正的評估，並尋求認識的系統化，仍然是項難度極大的挑戰。依據自己的研究和觀察，他提出，實踐“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其內涵應至少包括以下八點要求：

一是一個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不容動搖的核心理念；

二是兩種制度：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澳門地區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兩制形成互補；

三是三個有利於與三大管治權力：特別行政區依法施政的成效要以是否有利於體現國家主權、是否有利於特區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是否有利於居民福祉增進和社會協調均衡來驗證，特區享有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授予的三大管治權力：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四是四個不變與四種意義：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原有法律基本不變、原有生活方式不變、自由港地位不變，實踐“一國兩制”具有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國際意義、理論創新意義；

⁴⁶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35頁。

⁴⁷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37-240頁。

五是五大原則：國家主權原則、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原則、中央權力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原則、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原則充分調動資源與團結大多數原則；

六是六種意識：主權意識、主人翁意識、法治意識、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廉潔意識、公僕服務意識、開拓創新意識；

七是七大作用：特別行政區正在發揮其不可取代的驗證作用、示範作用、導向作用、平衡協調作用、孵化催生（新事物、新理念、新思維）作用、緩衝中和作用、加固支撐（共和國大廈）作用；

八是八種關係：要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尊重中央政府與高度自治的關係、穩定與繁榮發展的關係、行政主導與合理制衡的關係、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改革創新與循序漸進的關係、依法施政與正確理解基本法的關係、堅定信念與理性思維的關係。⁴⁸

最後，就澳門特區今後踐行“一國兩制”談了自己的意見。楊允中教授認為制度建設是社會繼續取得進步的前提與保障，特區政府應着力於推動制度的構建與完善，而這又有賴於準確而全面地理解“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為了使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能夠不斷有效地得以堅持，進一步推動對相關領域的思考範圍與深度，進一步提倡有針對性、有目的性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尤其是深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這是落實“一國兩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這項基本國策得以順利實現的一個必要切入點和落腳點。為此，楊允中教授極力呼籲：特區上下一切有識之士不能不與時俱進地拓展思考空間的深度和廣度，把自己的認知體系調整到基本國策有效落實的高度；在特區，全面推動對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永遠不會過時，同樣，加大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入思考與系統研究也永遠不會過時。

三、前瞻提出“一國兩制”豐富與發展建議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和“一國兩制”也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楊允中教授積極思考和探索“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豐富發展，前瞻性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和建議，涉及憲法相關條文的修改、澳門核心社會價值觀的培育、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地位的提升、“一國兩制”文明建設等方面。

（一）提出修改現行憲法第30條的建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全國的行政區域實際上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考慮到這一情況，楊允中教授利用其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條件，早在2004年3月出席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並審議憲法修正案時就曾提出修改憲法第30條的建議，2010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前再次以正式途徑提出相關建議。他建議把憲法第30條第（一）項修改為：“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同時在本條最後增加一項內容，即：“特別行政區系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行政區域”，並作為該條第（四）項。其法理依據如下：

⁴⁸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58-260頁。

一是現行憲法已有第31條、59條、62條三條條文就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作出規範指引；

二是國家立法法已對特別行政區制度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加以並列，規定相關事宜只能制定法律；

三是基本法不僅在其序言和第11條中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性質和內涵作出了清晰指引，而且其全部條文都是規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規範；

四是從特別行政區現實更不難作出判斷：經基本法法制化、具體化的“一國兩制”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活生生的成功範例；特別行政區制度是港澳兩個特區的基本政治社會制度，它非但沒有改變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根本性質，反而為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增添了同國際社會接軌的有效媒體與載體；

五是“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其落實顯然具有長期性、穩定性、不可動搖性等要求。作出如上修訂相信對進一步提升特區居民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將帶來積極推動。

（二）呼籲悉心培育“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澳門同胞素有愛國傳統，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習近平主席的這一重要論述，生動說明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不斷鞏固和發展同“一國兩制”實踐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基礎，在“愛國愛澳”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是“一國兩制”始終沿着正確軌道前進的根本保障。回顧澳門回歸後的發展歷程，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離不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弘揚愛國傳統並大力開展形式多樣的“愛國愛澳”活動，這其中就包括了楊允中教授在內的澳門知名社會人士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楊允中教授高度重視社會核心價值觀在澳門踐行“一國兩制”的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在現代社會，貫穿人們對權與利的追求過程的一個核心因素是價值觀取向……價值觀通過人們的行為取向及對事物的評價、態度反映出來，是世界觀的核心，是驅使人們行為的內部動力……價值觀念是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價值觀支配着主體的評價和選擇……推動價值觀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助於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共同價值體系事關特區發展成效、事關‘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社會多元化、個性化、民主化不可逆轉，但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十分必要。”⁴⁹ 在這裏，楊允中教授將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與特別行政區的發展成效和“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實踐直接聯繫起來，切中要害，不可謂不令人折服。他的上述關於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作用的論述，正可謂一語破的，一針見血。

鑑於社會核心價值觀不會完全自發形成的這一情況，它需要政府乃至社會的有識之士正確引導並精心培育，且需逐步積累形成共識，楊允中教授提出，在全體居民特別是青少年中深入推進“一國兩制”教育，必然導致新型“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形成。按照通常核心價值標準判斷，“一國兩制”文明觀可以理解為包括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競爭觀、發展觀等等基本理念。⁵⁰ 鑑於澳門居民素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楊允中教授在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的各種場合和機會，大講特講澳

⁴⁹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107-108頁。

⁵⁰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67頁。

門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講特講愛國與愛澳的有機統一性，大講特講“一國兩制”方針的科學性和正確性，這些都無疑十分有助於人們逐漸形成並鞏固“愛國愛澳”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正是有了特區政府和各社會團體的持續共同努力，再加上包括楊允中教授在內的有識之士的傾情奉獻，“愛國愛澳”核心價值在澳門社會居於主導地位。

楊允中教授不僅極力強調“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並結合自己的認識簡要闡明“愛國愛澳”的具體內容，而且強調要有的放矢地進行“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他認為，澳門居民中，中老年居民基本上都經歷過不同時代不同際遇磨練，因而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較易解決，而生長在物質豐裕時代的年輕朋友，對強調價值觀、競爭觀、發展觀等可能會有所偏愛，而對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則可能有所忽略。故此，通過各種教育形式令80後、90後以至00後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持續得到提升，這是一項關係到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的基本工程，要細水長流、長抓不怠。正是有了楊允中教授這樣一些社會上有識之士的不停呼籲和悉心培育，“愛國愛澳”的理念如今早已深深植根於澳門社會，並始終伴隨着澳門特區的發展而不斷強化，為“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和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

(三)竭力推進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中地位的提升

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因此，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僅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度載體，而且也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表現形式。“特別行政區制度”也是一個被國家立法法所正式確認的法律術語和法律概念，同時也是被國家立法法所明確規定的重要制度之一。然而，對於這樣一種嶄新而重要的制度，而且是經過十多年驗證被證明是行之有效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制度，理論界對其地位的認識，尤其是對這種制度在中國政治制度體系中的定位，卻沒有取得一致共識，這集中表現在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問題上。為了推進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中地位的提升，楊允中教授認為首先必須提升人們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關基礎知識的認知水準。為此，澳門回歸後，他的研究視線始終沒有離開過特別行政區制度這一領域。在他有關“一國兩制”的專著或論文中，特別行政區制度一直都是他的研究重點之一。例如，收入《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的文章，有多篇份量甚重的長文便是直接以“特別行政區制度”為標題。此外，該書收入的其他有關研究“一國兩制”理論以及“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文章，也都大量的涉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內容。該書的書名雖叫“我的‘一國兩制’觀”，其實也可稱之為“我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觀”。

透過深入研究的成果，楊允中教授認為要正確實施特別行政區制度，需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要建立健康穩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為此，他認為應積極參與構建同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適應的新型價值體系：一是尊重中央、尊重國家的層級觀念；二是維護憲法、憲制秩序的全域觀念；三是堅持以民為本的文明施政觀念；四是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觀念；五是“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是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奮進觀念。⁵¹ 在認真開展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相關基礎性研究工作的基

⁵¹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157-158頁。

礎上，楊允中教授始終不遺餘力地推動人們對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地位認知。他明確地提出，特別行政區制度應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理由：

一方面，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憲法保障。《澳門基本法》第11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這表明特別行政區制度具有完整的體系、科學的結構、有效的規範保障功能。

另一方面，從法律定位看現有基本政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應提升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根據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我國的政治制度可分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現有基本政治制度中排序最前、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接下來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對於新生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楊允中教授認為人們對其基本認知還存在進一步調整的必要。對照規範上述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相關法律可以看出，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顯具有六個“超越”：

一是其制定權、修改權均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民族區域自治法雖由全國人大制定，但其修改卻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至於規範基層群眾自治的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二是兩部基本法制定過程最長，均長達四年半以上，不僅規範民族區域自治和基層群眾自治的法律不能相比，而且超出現行憲法起草的時間一倍以上，說明基本法具有特殊重要性；

三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正式頒佈與生效之間的時間分別有7年3個月和6年8個月的巨大提前量，創下了當代中國法制史和國際法制史之最；

四是基本法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兩種正式語文和特定標誌物，在特別行政區除懸掛和使用國旗和國徽外，還可懸掛和使用區旗和區徽；

五是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可以在適當領域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名義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這是中央授權下行使高度自治權的一個重要標誌；

六是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為了落實一部法律而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建立專門的工作委員會，這是前所未有一種制度創新。

在三項涉及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自治制度中，特別行政區制度體現的高度自治，包括了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而且超越國際上實行自治制度的任何地方。這種創新做法不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理論是一場深刻變革和巨大的突破，而且業已得到兩個特別行政區多年的社會實踐的有效驗證。因此，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別行政區制度排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之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前是公正而適宜的。⁵²

楊允中教授不僅通過著書立說來論證特別行政區制度應作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而且還極力推動與內地學者聯合開展有關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學術研究活動。2011年12月17日，當時的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聯合舉辦了特別行政區制度專題研討

⁵² 楊允中、黃來紀、李志強主編：《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第31-41頁。

會。會上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定位、進一步拓展“一國兩制”研究的資源投入和人力支撐，是完全必要、勢在必行的。會後集結出版的論文集《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是對會議和有關研究成果的總結，有助於推動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的深化。正是在楊允中教授等人的長期堅持和推動下，特別行政區制度開始受到內地和港澳地區學者包括政界人士的關注，有關的研究也逐漸興起，認同應將特別行政區制度確立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知名學者也漸漸多起來，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李林教授、武漢大學的周葉中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尤俊意研究員、華東政法大學的童之偉教授等，都撰文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應確立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甚至有的學者如童之偉教授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成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相信隨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不斷成功實踐，會有越來越多學者加大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研究，這為中國將來從法律上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應有地位奠定理論基礎。

(四) 倡導全面推進“一國兩制”文明建設

楊允中教授認為，在特別行政區，伴隨“一國兩制”實踐的展開，“一國兩制”文明已經在形成，它是中華文明在新時代的昇華與結晶。對於“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內涵，他總結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愛國觀，一個人生存與成長不能脫離社會群體，熱愛生於斯長於斯的熱土，熱愛同宗同祖、同文同語的同胞鄉里，這是人的常情常理。作為故鄉養育成長的人士，應該堅持起碼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在當代，就是要做到“愛國愛澳”、愛群愛己。

二是是非觀或價值觀。要力求做到核心價值不被扭曲，基本行為不受干擾，尊重客觀、尊重事實，實事求是；在原則面前不退步，大是大非面前有主見。

三是奮鬥觀或競爭觀。要力求做到敢為人先、敢闖新路；肯付出、懂競爭，敢於憑實力、憑知識、憑智慧、憑信譽取勝；與時俱進，跟上節奏，馬不停蹄。

四是生存觀。要珍惜時間，做時間的主人，善用空間；積極樂觀，目光朝前；創健康體魄，也創健康的行為準則。

五是榮辱觀。要理解個人榮辱與國家、民族榮辱的一致性。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榮辱觀，在澳門被廣泛認同，如能保持常態認知並付諸行動就更好。⁵³

楊允中教授提出，有時代特徵的“一國兩制”文明，是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和憲法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推進“一國兩制”文明建設，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序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此，他提出應在以下多個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提升政治認同度。國家認同有三個層次，既有對共同種族、共同地域這樣較低層次上的認同，也有愛國心、民族自豪感這類情感上的認同，還有對國家法律制度、政策方針理解與贊成這種高層次的認同。在澳門，三個層次的認同都有全面加強的必要，凡涉“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重大問題，都要肯於堅持，敢於擁護，用理性思維回應來自任何方面的挑戰。

⁵³ 楊允中：《“一國兩制”實踐論》，第27頁。

二是擴大政治參與面。在澳門特區，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廣大居民的參與機會是很高的，參與面也很寬。其中，屬於政治層面的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均有很高的透明度，雖然因歷史原因，有的選舉採取間接選舉形式，但不影響選舉結果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廣義地說，政治參與還包括對祖國建設與發展及國際地位提高的關注、對保持中央與特區健康關係的關注、對國慶及特區成立周年活動的參與、對國家及特區領導人外訪的關注、對國家及特區重大活動如“兩會”等的關注。透過這些積極參與，可以提升對國家發展民主政治、完善國家運行機制的關注和促進，也有助於提升居民的綜合素質。

三是建立正確的政治價值觀。在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進程中，“愛國愛澳”應成為特區居民的首要核心政治價值。愛國必定愛澳，兩者並不矛盾。凡是健康積極的事物都應得到理解與支持。與此同時，還要有現代法治觀、現代發展觀和諧觀。

四是堅持行為理性化。法律許可的政治行為可以提倡、可以保護，但法律禁止的政治行為則要排斥、抵制。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一定不能作出。

五是強化公民教育。要建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亦即要建立正確的權利平等意識、權利義務對應意識、國權人權一致意識、合理維護與自我約束意識、坐言起行自我完善意識等等。澳門要成為學習型社會、精品型社會、和諧型社會之外，也要成為一個健康型社會。⁵⁴

四、參與構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宣傳與研究平台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持不懈宣傳推廣“一國兩制”政策和《澳門基本法》，形成政府主導、官民結合宣傳教育機制，不斷鞏固“愛國愛澳”的社會基礎，促進“愛國愛澳”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確保了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並行穩致遠。澳門宣傳推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喜人局面及重大成就，離不開包括楊允中教授等知名社會人士的艱辛付出。特別是在構建推廣基本法與研究“一國兩制”的平台方面，楊允中教授更是作出了突出貢獻。正是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才營造出如今“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澳門全社會更加深入人心的良好氛圍，“一國兩制”實踐的政治社會基礎更加堅實。

(一)牽頭組建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澳門基本法》頒佈後，1993年9月17日由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澳門委員和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共同組成澳門基本法協進會，以推廣宣傳《澳門基本法》，楊允中教授時任協進會副秘書長，積極參與基本法宣傳工作，為促進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作出了貢獻。

為適應澳門回歸後形勢發展的要求，楊允中教授與廖澤雲、崔世昌、賀定一、李鵬翥四位熟悉基本法有關事宜的人士經過精心籌劃，並得到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大力支持組成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於2001年3月31日基本法頒佈八周年紀念日正式成立。基本法推廣協會以擁護及推廣“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為宗旨，配合特區政府致力從事基本法宣傳推廣和研究工作。自成立以來，基本法推廣協會通過舉辦基本法培訓課程、基本法四格漫畫巡迴展覽、“基本

⁵⁴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87-292頁。

法字謎宮”報章遊戲、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周年圖片展覽及學術講座與研討會、基本法與特區法律問答比賽、基本法演示文稿PowerPoint設計比賽、文藝晚會、園遊會等形式，廣泛深入地向各界居民宣傳《澳門基本法》，在社會上形成學習、宣傳及擁護基本法的熱烈氛圍，這也是澳門回歸以來所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為澳門特區貫徹落實基本法和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在基本法推廣協會舉辦或合辦的重大活動中幾乎都能見到楊允中教授忙碌的身影，他不僅與大家一起籌劃活動方案，而且相關研討會都親自提交論文，並擔任主編負責出版相關會議論文，以便更好地向外宣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深刻內涵以及在澳門的生動實踐，對外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進而更廣泛地形成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

（二）參與創立澳門學者同盟

澳門是個社團社會，現今大大小小的社團有一萬多個，包括了一些從事學術研究的團體，當中有楊允中教授聯同本澳學界知名人士共同創建的，例如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學者同盟等。其中，創立於2006年的澳門學者同盟如今成為澳門社會科學界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學術團體。它由本澳從事學術研究、專業研究及理論研究的專家學者組成，是具有法人資格的非牟利性專業社團。學者同盟以“思考澳門、研究澳門、發展澳門”，創建“一國兩制”文化為宗旨，以堅持實事求是、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堅持開放思維、堅持學術民主、學術自由、尊重學者的首創精神為活動原則。自成立以來，澳門學者同盟團結澳門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及相關人士，發揮學者同盟會員專業背景多學科、多領域的先天優勢，立足“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緊扣國家發展戰略，結合澳門實際情況，就澳門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和宣傳推廣工作，並透過創建澳門學者文庫將相關研究成果公開出版發行，至2025年6月，文庫已出版會員專著28本，為推進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澳門特區繁榮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和智力支撐。此外，針對不同時期澳門社會的政治以及經濟民生等熱點焦點難點問題，學者同盟會員結合自身的專業知識主動撰寫文章在《澳門日報》等發表，以主流聲音引導社會輿論，以主流價值凝聚社會共識，傳播積極向上、團結奮鬥、共克時艱的正能量，助力特區政府牢牢掌握“一國兩制”話語權，確保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正確方向前行。

2024年8月，為適應新時代“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新發展，學者同盟進行重大重組。重組後的澳門學者同盟將進一步凝聚團結澳門理論界、社科界、學術社團的力量，實現學術界大團結大聯合大協作，通過着力宣傳普及社科知識，緊密學術團體之間的聯繫，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培養社科人才梯隊，致力打造成澳門社科理論界的公共服務平台，以更好發揮愛國骨幹社團作用，擦亮澳門社科理論創新“金名片”。

為促進澳門學術界加快融入祖國學術大家庭，並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貢獻澳門智慧和力量，2025年6月10至13日，澳門中聯辦組織澳門學者同盟北京參訪團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取得豐碩成果。此次參訪團是澳門回歸25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首個大規模訪京團，參訪團團員由來自多個社科領域的資深專家與中青年骨幹學者組成，充分體現澳門社科理論界的專業深度、學科廣度與代際傳承。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夏寶龍主任在會見參訪團時表示，澳門學者同盟長期以來為支持澳門發展和“一國兩制”事業所做的工作值得肯定。中央政府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長期不變，將一如既往

支持澳門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希望澳門學者同盟繼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把理論研究和澳門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加快橫琴開發建設等方面獻智出力，為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新貢獻。

學者同盟能夠取得如今的驕人成就，離不開楊允中教授等前輩們的“播種開路”。重組後的澳門學者同盟將繼續沿着楊允中教授等前輩們開辟的學術道路，以夏寶龍主任的充分肯定和激勵為契機，團結廣大會員，練就過硬專業素養，心懷“國之大者”，堅持做好學術研究、諮詢建言等工作，握好學術之筆、智庫之筆、媒體之筆，集中力量梳理澳門各種重點難點社會問題，協同攻擊，在做好充分調研和論證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對策，供特區政府施政時參考。同時，不斷深化“一國兩制”基礎理論研究，助力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和中國故事，致力將澳門打造成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

(三) 推動創辦“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經楊允中教授推動，2008年8月，澳門特區政府透過第218/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在當時的澳門理工學院（現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範圍內設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宗旨是建立關於“一國兩制”原則的策略性資料的參考依據。中心的設立，在港澳地區具有開創性意義。港澳地區以及內地也有名叫“一國兩制”研究的學術單位，但都不是政府決策設立的，唯有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是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決定設立的，是特區政府高端決策的產物。

中心成立後，楊允中教授擔任首任主任。在他的帶領下，中心全體學術人員堅持“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在“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憲法和基本法的教學推廣等方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社會的認可與肯定。目前中心除承擔澳門理工大學本科生的憲法與基本法必修科目，以及不同學院本科生的法律、經濟學、社會學、公共行政、語言等課程，還有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公共管理等碩士研究生和公共政策博士研究生的相關課程的教學工作外，還堅持以“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為對象，就完善與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展開研究，助力推進澳門特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此，中心主辦有《“一國兩制”研究》學術期刊，出版“一國兩制”文庫，並組織以及派人參與學術研討會和論壇講座等，以促進相關研究工作。

此外，中心還積極開展社會服務，包括開辦面向本澳不同層次公務人員與中學生兩個重點群體的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其中，與行政公職局和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開辦的以領導及主管級公務員為對象的憲法高級研討班和基本法高級研討班，和以高級技術員公務員為對象的憲法研討班和基本法研討班，以及與本澳中學合作舉辦的“憲法與基本法走進校園”講座，深受學員和師生的歡迎和好評。

(四) 支持籌建“一國兩制”博物館

早在2003年，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楊允中教授就曾向國家有關部門遞交過建設“一國兩制”博物館意見書。他建議在博物館裡可以把“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的資料和文物集中展示，也可以將香港、澳門回歸之前放在別的博物館裡的資料轉移歸納過來，把反映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重要的文物集中起來，在首都北京建設一個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不僅有助於宣傳“一國兩制”的優越性，還有助於人們理解兩大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優勢互補的積極成

果，有助於為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提供借鑑思考，在新時代有着非同尋常的全球意義和全球價值。

2019年5月25日，由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南開大學法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等主辦的“一國兩制”博物館籌備座談會在廣東東莞舉行，來自大陸、香港、澳門的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並提出建議和思考，圍繞博物館的意義、選址、架構、館藏、功能、人才等進行探討交流。楊允中教授參加了這次座談，並希望博物館承載多重功能，不僅僅是搜集文物搞展覽，它實際上還是一個愛國教育基地，這也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情。目前，“一國兩制”博物館籌建工作正有序推進，未來“一國兩制”博物館落成並投入使用後，將充分發揮其記錄歷史、留住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年輕人，以及作為國際國內交流交往平台等功能，有助於還原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增強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感，並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傳播、對祖國和平統一起到獨特的作用。

五、結語

楊允中教授曾說過：“從澳門回歸祖國前、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實現‘一國兩制’，我從頭到尾參與了全過程，能作為特區歷史的見證人，我感到十分幸運。”的確，楊允中教授於澳門回歸前已開始參與《澳門基本法》的起草服務工作，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親歷基本法產生和澳門特區成立的全過程。澳門特區成立後，楊允中教授通過多種形式的學術研究活動，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開展“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的推廣工作的同時，對於澳門社會關心的話題，以及政府施政需要完善的問題，始終以建設性的態度來分析並提出意見和建議，不僅在澳門，而且在內地甚至香港也贏得了口碑。事實上，無論在澳門回歸前或後，他都全力參與推廣基本法，推動基本法在澳門的全面落實，是名副其實的澳門特區成立及其發展的重要見證者、參與者及貢獻者。

楊允中教授還曾說過：“作為幾十萬澳門居民中的一份子，要把機遇最大限度發揮好、把握好、利用好。說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做起來有很大的難度，對每一個人都不是現實的考驗。”楊允中教授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信仰“一國兩制”、熱愛“一國兩制”，他關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所作的深度思考，以及所提出的許多觀點、判斷、方法論等，為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們留下了寶貴的學術財富。如今紀念楊允中教授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新時代“一國兩制”的重要使命要求，繼續認真總結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經驗，增強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自覺性與堅定性，助力澳門打開發展新天地，不斷創造新輝煌，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編輯：庄真真]